

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堤外廣土水環流：

防洪建設、人水關係與社子島地景張力

Flood Control Infrastructure, Human-Water Relations, and
the Tensions of Shezidao Landscape in Taipei

徐碩

Shuo Hsu

指導教授：洪伯邑 博士

Advisor： Po-Yi Hung, Ph.D.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February 2021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堤外廣土水環流：

防洪建設、人水關係與社子島地景張力


Flood Control Infrastructure, Human-Water Relations,
and the Tensions of Shezidao Landscape in Taipei

本論文係徐碩君（學號 R07228014）在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0 年 1 月 13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指導教授) (簽名)

 _____ 洪廣興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謝誌

首先感謝我的每一位田野報導人，恕我基於學術倫理不便公開你們的姓名。祝你們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感謝指導教授洪伯邑老師，有耐心地循序漸進指導我做研究，讓我順利完成本論文。感謝口試委員洪廣冀老師、廖桂賢老師，讓論文更為完善。謝謝周素卿老師、林嘉南學長、郭育安學姊、張怡婷學姊在專討二課堂的意見。謝謝徐進鈺老師、黃宗儀老師、李美慧老師，在這幾位老師的課程中所學，對我極有幫助。感謝簡旭伸老師給我的提點。感謝大學時期的恩師們，包括（但不限於）江柏煒老師、胡元玲老師、張碧君老師、潘鳳娟老師、邵軒磊老師、王文誠老師、吳鄭重老師、張峻嘉老師、鄧時海老師、張志威老師、劉一民老師。

謝謝王志文老師、江聰明老師兩位社子島研究的前輩，有機會與你們交流、做田野調查是我的榮幸。感謝麒愷、健剗、又名、一嫻、昀叡、如璟、聿修、湘霖、東霖在研究與論文撰寫過程中的協助。謝謝大美老師以及福安國中的師生們，在校園陪伴孩子們種菜，是我相當享受的時光。感謝碩士班期間，士倫、敏帆、舞春食農工作室、走路草農/藝團給我的協助、鼓勵與支持。

感謝友璿學姊、宇禎學長，大學階段有機會認識你們，是我得以進入地理所就讀的助力。也在此感謝並祝福同為地理角徒的聿修、育安、于萱、冠仁、宇忻、思安、凱恩、慧雅、明堂、佩文、東霖、聖昌、佩岑。

謝謝爸爸、媽媽還有其他家人，以及湘霖，你們始終做我最堅強的後盾，讓我能無後顧之憂完成學業，並不離不棄支持我的選擇。也感謝正念動中禪學會，在這裡禪修，對我能身心還算健康地完成論文有莫大的幫助。

感謝諸佛菩薩、恩主公、中壇元帥、黑虎將軍、玄天上帝、天上聖母、水仙尊王，以及社子島各聚落的土地公、陰公陰媽們。謝謝你們保佑我平安完成研究，在此我也誠心祈禱你們繼續保佑社子島的人們，乃至一切眾生。謝謝了這麼多人與非人，這論文若有不足或錯誤之處，責任由我承擔。



摘要

在既有的學術討論中，基礎建設經常被視為常民無法、或甚少感知的系統，唯有在意外時才會從隱形變為可見。儘管此種觀點在近年已遭挑戰，基礎建設的感知面向仍有待探索。本文以與社子島有關的防洪建設為主題，探討基礎建設作為「地景」，如何透過「再現」與「日常生活」被感知。社子島在 1970 年被經濟部指定為「洪氾區」，但仍持續有居民在社子島生活。臺北市政府於 1974 年開始建設社子島防潮堤，該防潮堤並於 1987 年核定的「社子島築堤保護案」提高到 20 年洪水重現期距的強度至今。期間，社子島先後興起了蔬菜專業區、未登記工廠聚落等土地使用。本文討論臺北都會及社子島的防洪基礎建設之再現，以及社子島居民們的日常生活，發現社子島與臺北都會防洪建設的差距，與社子島落後、與都會隔絕形象有所連結。而社子島防潮堤的綠美化措施，試圖翻轉社子島的負面形象，卻排除部分在地居民參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更拉開社子島與臺北的距離。至於社子島的親水生活、與水有關的民俗活動，以及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則呈現有機、多元的特性。透過觀察社子島與臺北都會的關係，以及社子島地景之「再現」與「日常生活」的交集，本文主張社子島的處境，不只是「社子島遭臺北犧牲」的論述足以理解，而是涉及了社子島與臺北都會兩套防洪建設的衝突，並與「洪水」必須排除在「都市」之外的觀點有關。而地景的「再現」與「日常生活」並非總是對立的兩端，而是具有緊密的連結，並在不同情境下浮現互相穿梭的動態。

關鍵字：防洪基礎建設、人水關係、地景、社子島、臺北

Abstract

Scholars used to regard infrastructures as systems that people cannot, or can only seldom perceive, and that only become “visible” under emergencies. Despite the above-mentioned perspective has been challenged in recent years, the discussion regarding perception of infrastructure is still yet to be explored. This thesis used flood control infrastructure (FCI) related to Shezidao as a study subject to explore how people perceive infrastructures through representation and everyday life. Though Shezidao was designated as a “flood zone” of Taipei metropolitan b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in 1970, there were still residents living. To mitigate flood risks in the area,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started the construction of Shezidao tide-break levee in 1974. In the 1987 plan, the levee was heightened to defend Shezidao against a 20-year flood. From then to date, unique land-use types, such as special zone of vegetables and clusters of non-registered factories, gradually formed. This thesis drew on “landscape” perspective to analysis the representations of FCI of Taipei metropolitan and Shezidao, as well as the everyday life of Shezidao residen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gap between the two FCI systems resulted in the image of the backwardness and isolation of Shezidao.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conducted greening programs of the tide-break levee to reverse the negative image. However, some local people were not included in the programs. Therefore, the city government had once again reproduced the separation of Shezidao and Taipei to a certain degree. Nevertheless, with th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that intimate to water, the everyday landscape of Shezidao presented organic and diverse features. This thesis examined the relation between Shezidao and Taipei, as well as the intersection of “representation” and “everyday life” of Shezidao landscape. This thesis argued that Shezidao is not simply “an area sacrificed by Taipei.” The situation of Shezidao is related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FCI systems and the idea that the flooding water must be excluded from the urban space. Moreover, landscape of “representation” and “everyday life” not always is a binary opposition, but deeply connect and shuttling through each other under different contex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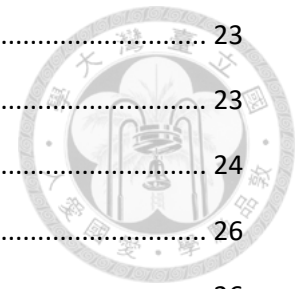
Key words : flood control infrastructure, human-water relations, landscape, Shezidao, Taipei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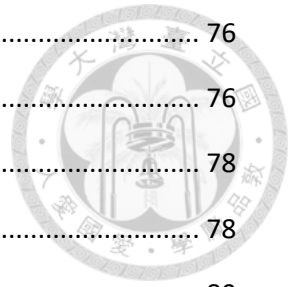


謝誌.....	i
摘要.....	ii
Abstract	iii
目錄.....	iv
圖目錄.....	vi
表目錄.....	vii
第一章 緒論.....	1
一、研究背景.....	1
二、防洪建設與社子島地景.....	3
三、研究問題.....	6
四、章節安排.....	7
第二章 文獻回顧.....	8
一、社子島與臺北防洪、人水關係相關研究評述.....	8
二、都市理論與基礎建設研究.....	10
(一) 基礎建設：連結跨尺度行動者的匯聚力量.....	11
(二) 防洪基礎建設：水陸二分的都市化的關鍵基礎.....	12
三、地景觀點：再現、日常生活與張力.....	14
(一) 作為「觀看的方式」的地景.....	14
(二) 地景與日常生活.....	15
四、小結.....	16
第三章 研究方法.....	18
一、研究區介紹.....	18
二、研究方法.....	21
(一) 基礎建設地景的變遷：文獻分析與口述歷史.....	22

(二) 基礎建設的再現：文本分析與訪談	23
(三) 基礎建設與日常生活：訪談與參與式觀察	23
三、研究者的位置與限制	24
第四章 從沙洲到「洪氾區」：都市防洪建設與社子島的變遷	26
一、河中浮現的沙洲	26
(一) 社子島沙洲的形成	27
(二) 浮動的沙洲	28
(三) 與水相連的土地使用與日常生活	29
二、限建之下的築堤	32
三、「洪氾區」之後	35
(一) 蔬菜專業區與農業的興衰	36
(二) 未登記工廠的興起	37
(三) 多元的居住與住家型式	40
四、小結	41
第五章 臺北市（最美）的鄉下地方：文本與綠美化措施中的堤防地景	43
一、再現社子島	43
二、文本中的堤防地景	44
三、大自然的樂園：堤岸地景的綠美化	47
(一) 堤防地景作為社區基礎建設：堤階綠化認養與藝術介入社區	47
(二) 人工濕地營造	50
四、小結	55
第六章 「洪氾區」的另一面：防洪建設、人水關係與社子島的日常生活地景	59
一、沒有人的生態天堂？社子島居民的河濱日常	59
二、傳統民俗與人水關係	62
三、「洪氾區」的日常生活	67
(一) 禁建之下的築造活動	67
(二) 社子島作為家園	72
四、小結	74



第七章 結論.....	76
一、堤外廣土水環流：都市防洪建設的限制、衝突與機會	76
二、地景觀點再檢視.....	78
(一)「觀看的方式」與「日常生活」的張力、揉雜與穿越	78
(二)地景觀點與防洪基礎建設研究.....	80
參考資料.....	82
一、中文部分.....	82
二、英文部分.....	86



圖目錄

圖 1 渡頭堤防（左）與社子島防潮堤（右）交界處.....	1
圖 2 本研究田野地圖.....	21
圖 3 近浮洲聚落的菜園與工廠.....	37
圖 4 忠興工業的作業員操作 CNC 電腦車床.....	39
圖 5 溪沙尾的信仰中心坤天亭.....	46
圖 6 堤階綠化認養.....	49
圖 7 社子島時光隧道壁畫.....	49
圖 8 生長在社六濕地的鹵蕨.....	52
圖 9 社子島濕地設計圖.....	53
圖 10 社子島濕地.....	54
圖 11 位於溪洲底淡水河濱的船屋.....	61
圖 12 浮洲划龍舟祭江儀式的水仙尊王香案.....	63
圖 13 浮汕划龍舟祭江儀式.....	64
圖 14 搭著鐵皮的磚頭厝.....	69

圖 15 經翻修後成為二樓高的住家	69
圖 16 基地填土的住宅	70
圖 17 居民自製的擋水閘	71



表目錄

表 1 報導人資料表	20
------------------	----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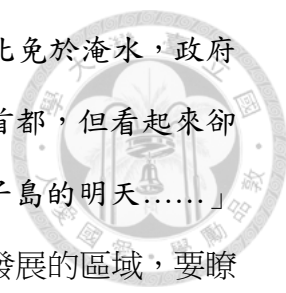
2015 年底的某日，我沿著淡水河堤外河濱自行車道騎單車前往北投，在中途於延平北路六段與七段交口附近的涼亭稍作休息。從那裡往河的對面一望，可以看到三重重陽重劃區的高樓大廈，櫛次鱗比地聳立在河畔；一回頭，則有一間預拌混泥土場、幾間鐵皮屋工廠，以及低矮的樓房，空氣中則傳來營建混合物的味道。此時，轉頭留意後方背景，則可看到兩道高低不同的堤防，比較高的那座位在後方，並隔絕自己身處的土地。我趕緊拿出手機看地圖，才知道自己已經來到社子島，一個在印象中時常淹水、因臺北的防洪考量而發展受限的地方。



圖 1 渡頭堤防（左）與社子島防潮堤（右）交界處

兩者的保護強度分別為分別為 200 年與 20 年洪水重現期距 資料來源： 作者拍攝

回到住處後，我上網找到一則關於社子島的報導。對於社子島的處境，記者



是這麼說的：「這裡的居民真的很渴求改變，當年為了保護臺北免於淹水，政府一道『禁建令』，讓社子島的時空停留在 50 年前，明明位於首都，但看起來卻是有極大差異……同樣的首都，同樣的繳稅，一道堤防，鎖住社子島的明天……」（TVBS 新聞，2015/1/18）。身為因為防洪安全需求而遭限制發展的區域，要瞭解社子島，必須從都市發展與防洪基礎建設的關係著手。社子島的案例，也可以成為討論都市與水，尤其是都市與洪水之關係的出發點。從地景（landscape）觀點切入，並可以進一步探索人們如何透過再現（representation）與日常生活感知基礎建設。

探討都市化過程與水關係的 Kaika（2005）指出，當代都市將水分為「好水（good water）」與「惡水（bad water）」兩類，前者指的是受控、安全、潔淨而養育人們的水，人們透過水庫、淨水廠、自來水道等基礎建設將其納入都市生活之中；至於不受控制、髒污、對人的生命財產造成威脅的「惡水（bad water）」，則是當代都市的治理者積極排除或隱藏的對象，而「洪水」便是其中一個例子。因此，人們以築堤、劃設洪氾區、開分洪道等方式，避免洪水對都市造成災害，然而，這些防洪技術並無法使洪水消失，而僅將洪水分散、導引或滯留於保護區以外的空間，使得以特定範圍為保護區域防洪基礎建設，可能會對比鄰保護區域的地區造成差異甚至負面的影響（Kane 2018；Liao, Chan and Huang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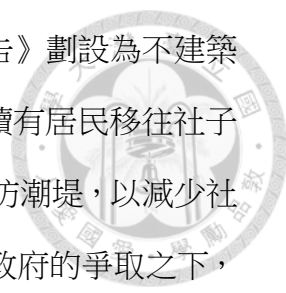
臺北都會防洪基礎建設之系統的建置，可追溯至日治時期興建的河溝頭堤防、大稻埕護岸等工程（簡佑丞，2019）。國府治理臺灣後，於 1960 年代開始擬定、實施「臺北地區防洪治本計畫」，並以「200 年洪水重現期」為高保護範圍的防洪標準。隨著都市擴張，行政區劃屬於新北市（舊臺北縣）的三重、蘆洲等地區，也在 1980 年代劃入高保護範圍中（經濟部，2010）。但位於淡水河、基隆河匯流處、人們稱作「社子島」的區域，因為地勢低窪、當時土地價值較低，未劃設

在「臺北地區防洪治本計畫」的保護範圍之內，甚至在《臺北地區防洪計劃檢討報告》與《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要計畫案》於 1970 年公告以來，成為以防洪安全考量的「洪氾區」與「限制發展區」，至今仍是臺北都會少數尚未落實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規範的區域，有著獨特於臺北都會其他地方的空間特性（台灣省臺北地區防洪治本計畫執行委員會，1968；林欣慧，2005；經濟部，2010）。2018 年 7 月，內政部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通過柯文哲市政府主導的「生態社子島」主要計畫，該計畫擬以全區區段徵收的方式開發社子島，截至 2021 年 2 月為止，仍有二階環評、區段徵收計畫等程序尚未完成（臺北市政府，2021）¹。

為了解都市發展與防洪基礎建設的關係，本文以社子島為研究區域，試圖理解受都市防洪基礎建設衝擊的區域，如何在都會發展的過程中，成為受到不同力量拉扯，而成為具有獨特地景的地方。本文並以臺北都會與社子島的防洪建設為關鍵的地景，探討在「臺北地區防洪計畫」的限制之下，社子島防潮堤的建設與改建，如何影響社子島的土地性質、土地使用方式與日常生活，並透過「地景（landscape）」視角，探討堤防與堤岸地景的「再現」與「日常生活」，如何反映、形塑社子島的空間特性。最後，本文也反思防洪建設對都市發展帶來的影響，並且討論「再現」與「日常生活」兩種不同地景之間的關係。在簡介完研究背景之後，我將說明以防洪建設作為討論焦點的理由，接著帶出本文的研究問題，並於章末介紹本文各章安排。

二、防洪建設與社子島地景

¹ 該開發案引發了破壞生態環境、影響臺北都會防洪安全、威脅弱勢居民生計、抹除聚落紋理與文化資產等疑慮（相關討論請參見鍾振坤，2016；廖桂賢，2017a、2017b；柳志昫，2018；林吉洋，2019；朱淑娟，2019）。



雖然社子島在 1970 年公告之《臺北地區防洪計劃檢討報告》劃設為不建築堤防的「洪氾區」，但既有的居民仍持續在社子島生活，且持續有居民移往社子島居住。1974 年，臺北市政府開始興建保護強度較低的社子島防潮堤，以減少社子島遭洪水侵入的機會。1987 年，在部分社子島居民與臺北市政府的爭取之下，行政院核定「社子島築堤保護案」，將防潮堤的平均高度加至 6 公尺，達到約相當於「20 年洪水重現期」的保護標準（經濟部，2010）。

在堤防建築以前，社子島是土地性質不穩定，時常因洪水而變形的沙洲，甚至曾有因應土地時常變形的土地共有制度存在（王志文，2004、2007a、2007b）。隨著社子島防潮堤將水與土地隔離，社子島的土地因洪水而變形的情形大為減少，居民們的日常生活，也從與水相依的生活，轉變為疏水的生活方式。在堤防兩次增高之後，社子島的土地使用有了更多可能，於既有的農業用地之外，從 1980、1990 年代開始，大量出現許多未登記工廠，並出現多元的住家形式，成為約 1 萬名居民居住的區域。儘管如此，社子島的堤防高度維持在 6 公尺，而未落實都市計畫的土地使用規範，使得社子島成為相對臺北都會的獨特地方。

儘管社子島防潮堤的平均高度繼續維持在 6 公尺，隨著一連串的綠美化措施，社子島的堤防也產生了新的功能與意義。從 2006 年開始，由臺北市政府水利處、錫瑠綠化基金會與社子島富洲里的社區發展協會合作之下，社子島的居民組成「社子島堤階認養人聯誼會」，認養社子島防潮堤的堤階，在堤階上種植景觀作物，使得堤防成為社區活動的重要據點。此外，2013 年臺北市政府水利處也以基隆河側新堤防與舊堤防之間約 8 公頃的範圍為基地打造人工濕地，透過棲地的設計與維護，吸引磯鶇、青足鶇、環頸鴿、小白鷺等涉禽前來棲息，使得這塊濕地成為賞鳥人士時常造訪的地點。同時，水利處也訓練數十名來自社子島內、外的人士擔任生態志工，負責棲地維護、導覽、活動支援等工作。不論是堤階綠化認

養或是人工濕地營造，皆使得社子島的堤防地景，有了防洪之外的功能與意義，成為人們關注的地景。



此外，在柯文哲市長任內推動的「生態社子島」開發的爭議之中，堤防再度成為焦點。生態社子島計畫案預計以全區區段徵收的方式開發社子島，而將社子島的堤防加高至 9.65 公尺的高度，並將全區填土 2.5 ~ 4.5 公尺，以達到與臺北都會其他地方相同之「200 年洪水重現期距」的防洪標準。2019 年 11 月 11 日，支持生態社子島開發的議員陳政忠在質詢柯文哲時，要求市長承諾將於 3 年內啟動社子島堤防加高工程作業；另一方面，兩周之後，由部分在地居民組成的「社子島自救會」成員也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高舉「社子島不須 9.65 米高堤」的標語，主張社子島的堤防應維持原有的高度，不需再加高（李柏濤，2019/11/22；環境權保障基金會，2019/11/22）。

因此，受限於「臺北地區防洪計畫」的社子島堤防建設，不僅分隔了社子島的土地與水域，也顯現了社子島與臺北地區的差異；社子島的堤防也在堤階綠化認養、人工濕地營造等綠美化措施之下，成為社子島具有代表性的地景，而在影響社子島未來發展的「生態社子島」開發案的爭議中，社子島的堤防也是支持者與反對者們所關心、爭論的核心，對生活在社子島上的人們有獨特的意義。在上述的理由之外，於「臺北地區防洪計畫」之下，曾經具有「洪氾區」之定位的社子島，本身也是防洪基礎建設的一部分，而這個定位也廣泛影響了社子島的人水關係、土地使用與日常生活。因此，本文借用 Green (in press) 的視角，除了探討社子島堤防地景本身的再現與實踐之外，也將討論的焦點放在防洪基礎建設影響之下，社子島居民的土地使用、日常生活等各層面，並透過探討防洪基礎建設與社子島土地性質、土地使用的關係，以及社子島堤防地景的再現、論述與相關的日常生活，以理解防洪建設對都市相對外圍區域的影響。



三、研究問題

由上述研究背景的討論，可知堤防對於社子島的土地形式、土地使用與日常生活有非常緊密的影響。若沒有社子島防潮堤，社子島可能仍是時常變形而浮動的沙洲；受限於「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其較低的保護強度，影響了社子島的發展，使得社子島成為都市之中較特殊的地區。而近年來的綠美化措施，如人工濕地營造、堤階認養等，又帶給社子島堤防不只是防洪的意義；這些作為「觀看的方式 (ways of seeing)」的地景²，也與社子島人們的日常生活之間，產生 Wylie (2007) 指出，不同位置的人們在觀看、感知與創造地景時，彼此拉扯而有創造性的張力 (tensions)。因此，我的具體提問如下：

- (1) 作為因為都市防洪需求的「洪氾區」與「限制發展區」，社子島堤防的建設與改建，如何改變其土地性質、土地利用、日常生活以及人水關係？
- (2) 社子島的堤防地景，在媒體報導、民間書寫等再現中，呈現什麼樣貌？
- (3) 近幾年的堤階綠化認養、人工濕地營造等綠美化措施，如何賦予社子島的堤防與堤岸地景新的功能與意義？
- (4) 社子島居民們的常民文化、日常生活，如何與堤防與堤岸地景共同創造意義，並與外界對社子島地景的論述或再現之間產生張力？

² 「觀看的方式 (ways of seeing)」是英國左派文化藝術評論家 John Berger 提出的概念。Berger 主張，人們透過先於言語的「觀看」來認知、理解周遭世界，同時確認自身與周遭世界的關係。觀看一方面無法徹底用言語闡述，但卻非單純的刺激反應，而是與社會的生產方式與社會關係有關。透過分析西方油畫、攝影、商業廣告等影像 (image) 的象徵意義與社會功能，他強調這些人造的影像，合理既有的社會關係與秩序，並鞏固、榮耀了特權階級的地位 (Berger 1972)。



四、章節安排

本文共分為七章，第一章介紹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第二章的文獻回顧，則透過回顧社子島與臺北都會防洪相關研究、基礎建設研究與地景取徑等三類文獻，說明本文的理論架構與理論和經驗基礎。第三章的研究方法，則介紹本文的研究區域，並說明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口述歷史、文本分析、訪談、參與式觀察等。第四章分析不同時期社子島堤防的建設與改建，如何使得社子島從浮動的沙洲，轉而成為相對於臺北都會中心較為獨特的區域。在這過程之中，社子島防潮堤與臺北都會之社子堤防、渡頭堤防的交界，成為社子島與「臺北」的界線，而社子島防潮堤，則隔絕了水與土地，將社子島從親水的空間轉換為疏水的空間。第五章則從所謂「新文化地理學 (new cultural geography)」將地景視為「觀看的方式」的視角，討論社子島的堤防地景在各種文本的再現，如何描繪社子島的空間想像，以及近年堤階綠化認養、藝術介入社區、人工濕地營造等社子島防潮堤的綠美化措施，如何帶給社子島地景新的功能與意義。第六章則將視野轉至與防洪建設、人水關係有關的日常生活，討論社子島居民們的水岸生活、划龍舟祭江等民俗活動中的人水關係，以及社子島居民們在防洪建設影響下的日常生活中，防洪建設的角色與意義，並分析這些日常生活與再現、論述之間的緊張關係。最後的第七章，除了統整上述各章的研究發現外，並進一步反思防洪基礎建設與都市發展的關係，並針對地景理論，討論「觀看的方式」之地景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張力、揉雜與穿越，以及地景取徑對於理解、思考都市防洪議題的貢獻。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文以穿梭在「再現 (representation)」與「日常生活」的地景觀點分析社子島的堤防地景，理解地景的變遷與張力，並進一步與都市發展與非人環境、都市防洪基礎建設的討論進行對話。在本章，我將首先回顧社子島與臺北防洪及水岸發展等研究成果，接著討論人文地理學、人類學及科技與社會研究對基礎建設的相關研究，回顧這些研究對於都市與非人環境、都市與水關係的貢獻，並指出這些研究的限制與不足。最後再引入本文分析架構的地景觀點，包括 1990 年代以降將地景視為「觀看的方式」的傳統，以及晚近受到現象學啟發，強調「日常生活」的觀點，指出地景觀點對於推進防洪基礎建設研究的潛力。

一、社子島與臺北防洪、人水關係相關研究評述

針對臺北都市發展與非人環境之間的關係，江欣樺、王志弘與黃若慈(2018)討論坪林水源保護區的設置如何將臺北郊區納入都市化的影響範圍，讓人理解臺北的都市化過程，其涉及的人與非人環境的轉變，並不局限於市中心，而是遠超過臺北的行政區劃的疆界。至於臺北都會的防洪建設方面，王慶宗(2015)探討「臺北地區防洪計畫」與都市發展的關係，指出從 1960 年代以來的一系列防洪基礎建設，讓淹水範圍持續減少，而與臺北都會各地區的經濟發展、人口成長有高度的連結，卻因堤防的配置不同，而在地區與地區之間造成差異的結果。另外，Chien(2015)討論「臺北地區防洪計畫」與水岸發展的關係，談到「臺北地區防洪計畫」之不穩定而時常變動的性質，並以新店溪畔的溪洲部落為例，強調水岸空間之非正式 (informality) 對於地景的影響。除此之外，關注臺北地區水岸發展的王志弘(2013)、王志弘、黃若慈與李涵茹(2014)以及王志弘與李涵茹(2015)

注意到臺北地區水岸空間在 1990 年代至今的美學化、生態保育化、遊憩化的趨勢，他們並運用「綠色治理(green governance)」、「綠色縉紳化(green gentrification)」等概念，討論環境治理與都市發展的關係，指出水岸空間成為都市發展的「綠色資產 (green asset)」。

上述關於「臺北地區防洪計畫」與臺北地區水岸發展的研究，揭示作為容易淹水的盆地，防洪基礎建設與臺北都會的成長動態息息相關，而過往處於都市邊緣位置的水岸，也在生態保育化、遊憩化的趨勢下，成為都市發展的核心空間。儘管如此，這些研究多從防洪與環境治理的觀點討論臺北地區防洪計畫或水岸發展，而水岸空間意義的生產過程，如何由各種論述與再現所形塑？包括社子島居民等直接受到防洪建設影響的人們，其日常生活如何受到防洪建設影響，並進一步塑造水岸的地景？這些問題有賴更進一步的發掘。

關於社子島之研究，王志文（2004、2007a、2007b）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對於社子島各大聚落形成的歷史與文化，有詳盡的考究，並指出「水」對於聚落的分布、傳統土地管理方式有關鍵的影響。另外，謝梅華（2008）則從「規劃政治」與「市民意識」的視角，揭示了社子島作為臺北相對於都市中心的獨特性，並指出涉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左右著這個曾為沙洲之地方的命運，而傳統地方的聚落力量，也影響各種社區營造工作的進行。此外，Liao, Chan and Huang（2019）以「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的觀點指出，當前的防洪基礎建設的各項措施並未消除洪水本身，而是將洪水重新分配，使得部分地區面臨更大的威脅，甚至因遭劃設為洪氾區，使得原本相對邊緣的社群更脆弱、弱勢與邊緣化。在「臺北地區防洪計畫」中，社子島由於被劃設為「洪氾區」以及「限制發展區」，長期下來建築年久失修、弱勢人口比例高，在媒體報導下，

呈現相對於臺北的其他地區的「落後」與「遺棄」之感。Liao, Chan and Huang (2019) 從防洪技術與環境正義出發的討論，引起對於都市防洪技術的省思。

運用「地景」取徑的社子島研究，則有林欣慧（2006）與康旻杰（2017）兩者。林欣慧（2005）從「文化地景」的觀點，討論社子島的地域性，而將堤防等防洪基礎建設，與傳統廟宇、聚落建築、田園風光等地景並列為具有代表性，能建立社子島地域特性的地景。林欣慧的文章從內外對立的觀點討論地景，雖然顯現社子島地景的不同詮釋與想像，但對於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較缺乏關注。此外，她書寫時，堤階綠化活動剛開始進行，人工濕地營造則尚未開始。如今這兩項新的活動已經成為社子島的重要地景，有待本研究來進一步討論。至於康旻杰（2017）則以「地景敘事」手法，書寫並詮釋社子島居民的日常生活故事，以此看到從都市治理者、規劃者所看不見的面向，這篇文章讓人看到地景觀點對於社子島研究的擅長之處，但康旻杰（2017）偏重對日常生活細緻的書寫，而社子島上日常生活的經驗細節，與較大尺度之人與非人力量的關係，及其在社子島作為防洪計畫之洪氾區的意義，則有待研究者進一步發掘。

二、都市理論與基礎建設研究

人們長期以來將「都市」視為人造的、與「自然」無關的實體，而 Swyngedouw (1996、2004) 試圖透過立足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陳代謝 (metabolism)」概念，指出都市化的過程，伴隨著將自然物質轉換為可以支持都市機能運作之資源的「自然的都市化 (the urbanization of nature)」的機制。受到 Swyngedouw (1996、2004) 的啟發，Kaika (2005) 以「水」為切入點，透過雅典、倫敦兩座城市自近代晚期以來之自然的都市化的研究，指出都市化的過程中，出現都市內/外的「選擇性的可滲透性 (selective porosity)」的劃界過程。以水為例，當代都

市將水化分為乾淨、受控制、可親近的「好水 (good water)」與不受控、髒污、危險的「惡水 (bad water)」，而將前者納入、馴化為熟悉的內部，後者則排除、隔離在外或使之隱形成為陌生的他者。



Swymgedouw、Kaika 等以「自然之都市化」為關懷的學者讓人們意識到都市並非與所謂自然環境截然對立、彼此無關的存在；相反的，都市的運作仰賴自然環境的支持，而都市化的過程也對自然環境本身造成重大的影響。然而，儘管這些研究者已注意到都市化過程的影響所及超越一般認知的都市範圍，但 Angelo and Wachsmuth (2015) 指出，他們所關注的焦點仍以都市中心為主，犯了所謂「方法論的城市主義 (methodological cityism)」的謬誤。有鑑於此，Conolly (2019) 呼籲研究者以探討多樣性的空間與案例、關注民眾之日常生活、以基礎建設為切入點等方式，以超越「方法論的城市主義」。另外，Tzaninis et al. (in press) 則鼓勵研究者將視角從都市中心，轉移到受到都市與非都市不同力量之匯聚與拉扯的都市周圍地帶，並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投予更高的關注。

(一) 基礎建設：連結跨尺度行動者的匯聚力量

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 的字首 (infra-) 具有在下、之下、根本的意涵，在結構馬克思主義 (structural Marxism) 的觀點中，時常指涉作為社會基礎的生產關係，至於在晚近地理學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脈絡，則代表一股相對穩定、匯聚的關係與力量，而給予研究者一個連結不同尺度之人與非人行動者的研究架構與對象 (Carse 2017；洪廣冀與何竣頤，2018)，是特定社會與歷史背景下的關係性的實體 (relational entity) (Carse and Lewis 2017)。

Carse (2012、2014) 對於巴拿馬運河 (Panama Canal) 的討論，提供了一個基礎建設觀點如何連結不同尺度之人與非人行為者的案例。他將基礎建設視為「索求無度的環境 (a demanding environment)」，是各種關係不斷建立、瓦解的過程，並與自然環境之間有相互生產的關係。對於巴拿馬運河集水區在「保護」與「發展」之間的兩難，他不僅視其為「全球/在地」的衝突，而是涉及兩種基礎建設之間的對立，其中包括不同行動者之間的複雜關係。

為了理解都市發展與非人環境的關係，並且超越以行政區或傳統意義下的城市邊界為都市的範圍，Conolly (2019) 建議研究者可以透過基礎建設理解都市社會與非人環境的關係。基礎建設是都市化過程中社會與自然關係與城鄉發展轉換的核心，例如 Cronon (1991) 在芝加哥都市化與郊區發展的研究，將都市視為一個不斷向郊區蔓延的有機體，而高速公路等基礎建設，讓人群、商品、能源、原物料與資訊，得以在都市及其腹地之間流通，而具有領域的 (territorial) 性質 (Cronon 1991 ; Carse 2014)。另外，Gandy (2002)、Swyngedouw (2004)、Kaika (2005) 等都市水利基礎建設的研究，透過對紐約、倫敦、雅典等不同都市之發展歷程中的非人環境轉變，指出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庫、淨水廠到上下水道等水利建設，使得都市與非人環境之間的新陳代謝成為可能，而這一打開水龍頭即可享受自來水成為當代都市生活的共同經驗的背後，其實蘊含相當巨大的自然物質轉化的過程，並仰賴多種基礎建設才得以維持。

(二) 防洪基礎建設：水陸二分的都市化的關鍵基礎

Elden (2018) 提醒研究者對於陸地、水域、天空等不同性質的空間之特殊性給予更多的關注，而 Steinberg and Peters (2015) 透過對海水之流動、不穩定，且無時無刻都在變形之性質的討論，反省地理學者對於將地方或領域視為穩定線

性的認識架構。河口、沼澤、濕地等水陸交會之空間及其相關的社會關係，也使得水陸二分的關係更為複雜（Steinberg 2013）。在都市必須將洪水排除在外的觀點之下，防洪基礎建設，則是將親水的空間，轉換為不淹水之陸地的工具，是都市發展的過程中的相當核心的基礎建設（Kane 2018）。

人類學者 Kane（2018）探討加拿大溫尼伯（Winnipeg）的防洪基礎建設系統討論防洪技術延展與作用影響區域，注意到防洪建設對大尺度區域的保護，可能會增加保護範圍之外的小尺度區域的洪患風險，並將此種現象稱作「尺度不匹配（scalar mismatch）」。另外，亦有相關研究討論完工於 1957 年的泰國昭披耶大壩（Chao Phraya Dam），將昭皮耶河三角洲（Chao Phraya River Delta）從乾季時為旱地、雨季時則為水覆蓋的兩棲空間，轉換為可發展稻米農業的良田，並進一步發展新式建築、工廠、鐵路與公路等交通設施的建設的轉換過程（Morita 2016；Morita and Jensen 2017）。因此，防洪基礎建設，是將洪水等水體排除在特定空間的工具，為都市發展的關鍵；由於防洪建設的技術限制，以大尺度空間為保護目標的防洪基礎建設，對於較小尺度的區域可能反而增加其洪水的機率（Elden 2018；Kane 2018）。

這些關於防洪基礎的討論，指出區隔陸地與水域的防洪建設，在都市發展的過程中，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儘管如此，這些研究較強調防洪基礎建設與土地性質、土地使用的關係，而對於防洪基礎建設本身作為「地景」，人們參與、感知的面向較少著墨。在基礎設研究中，學界一度視基礎建設為人們無法，或甚少感知的系統，只有在意外才會從隱形變成可見（如 Star and Ruhleder 1996；Graham and Thrift 2007）。儘管此種觀點已在晚近受到動搖（Larkin 2013），部分討論基礎建設之感知的研究，較偏重基礎建設之日常生活，如 Anand（2017）針對印度孟買貧民窟的民族誌研究。而又有部分的研究，對基礎建設的再現投入較大的關

懷，例如 Gandy (2002、2014) 關於紐約、洛杉磯、巴黎等都市之水利建設的討論。至於「日常生活」與「再現」兩者的關係，則較少有研究者討論。此外，洪廣冀與何竣頤 (2018: 124) 批評目前大多數的基礎建設研究，對於受到基礎建設影響、參與基礎建設之人們，其日常生活與基礎建設之關係的書寫有所不足，而有「史料豐富但民族誌薄弱之感」。因此，為了理解防洪基礎建設之論述、再現與日常生活，及其之間的關係，並進一步探討基礎建設如何影響、塑造人們的日常生活，本文將採取穿梭在物質力量與意識形態之間，討論「再現」與「日常生活」之間之張力 (tension) 的地景觀點為分析基礎建設的架構與視角 (Matless 2003; Wylie 2007)。

三、地景觀點：再現、日常生活與張力

在回顧完社子島與臺北防洪相關研究與基礎建設研究後，我將說明本文的地景觀點及其運用。我以社子島的堤防與堤岸空間作為聚焦的地景，以理解社子島的堤防的建設與改建，如何影響社子島的土地性質，並連結社子島居民們的日常生活，同時透過在文本中的再現以及堤階綠化認養、人工濕地營造等綠美化措施，產生地景在防洪之外的意義，而與社子島居民們的日常生活產生張力。

(一) 作為「觀看的方式」的地景

人文地理學中的地景的概念，最早由美國地理學家 Carl Sauer 帶入地理學的討論。Sauer 視地景為固定而真實的實體 (entity)，並主張「文化地景 (cultural landscape)」是人類活動對自然改造的成果 (Sauer 2008 [1925]; Wylie 2007)。Sauer 的地景觀點對人類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之重視，突破了環境決定論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的限制，卻也受 1980 年代興起的「新文化地理學 (new cultural geography)」取徑批評這種觀點將人與社會單一化，忽略了社會階級與權力關係的複雜性 (Wylie 2007)。Denis Cosgrove、Stephen Daniels 等新文化地理學者進而指出，地景是源自於歐洲菁英的品味之一種「觀看的方式 (ways of seeing)」，代表特定階級之美學品味的凝視 (Cosgrove and Daniels 1988; Daniels 1989)。馬克思主義學者 Don Mitchell 進一步探討地景的生產過程，認為地景掩蓋了背後的階級壓迫，將不正義與暴力合理化、浪漫化與本質化，是一種「土地的謊言 (the lie of the land)」 (Mitchell 1996)，而地景則「提供了貫穿過去、現在與未來之時代的連結，再把這個連結抹去」 (Kirsch 2015: 822)。

(二) 地景與日常生活

相較於 Sauer 將地景視為研究者從外觀的實體，以戰後美國西南部地景研究聞名的 J. B. Jackson 則提出「常民地景 (vernacular landscape)」之概念，將視野投向住家、街道、辦公大樓等日常生活中尋常可見、非為了外界的觀看而塑造，也不須向外人表述的日常地景，研究者並以常民的觀點出發，強調人們日常生活的規律活動與地景之間的相互形塑過程 (Jackson 1997; Wylie 2007)。受到 J. B. Jackson 的常民地景概念，以及 Martin Heidegger、Maurice Merleau-Ponty 等現象學家，以及人類學家 Tim Ingold 的啟發之下，受現象學影響的地景研究，則將地景從外在、遙遠而靜態的再現，轉移到關注活生生的人在地景中的身體與感官的體驗，使得地景成為人們透過築造 (building) 而棲居 (dwelling)³ 其中的空間 (Wylie and Rose 2006; Wylie 2007)。因此，將地景視為人們透過築造而棲居其中的現

³ 所謂「棲居」，在 Heidegger 的脈絡之中，指的是「人們在大地的存在樣態 (the manner in which we humans are on the earth)」 (王應棠，2009: 28)。而作為棲居的「築造」活動，則意味著人們製造包括房屋等無法自行生長之物，以確保人們有免於威脅之安身立命之所的過程，是人們照料、改善環境，與萬物和諧共處的機制 (王應棠，2009)。

象學觀點，未將人視為遠離地景的觀察者，相反的，人是處於地景之中，不停與地景的人與非人元素互動，共同塑造地景，同時也由地景所塑造的雙向過程（Wylie 2007）。在此意義之下，地景「既非僅僅是種觀看的方式，亦非是所觀看之外在、靜態之物」，而是「我們伴隨著人們之感覺與行動之交織的物質性與感受」（Wylie 2005：245）。

Brace and Geoghegan（2010）將現象學對身體經驗的關懷，進一步延伸到日常生活與處境知識上，而不限於身體的感官經驗，並指出將日常生活觀點運用在環境變遷的研究中，可以更貼近理解人們究竟如何受到環境的變動影響。因此，在「日常生活地景」的觀點之下，地景觀點的範圍，從遠離的觀看的方式，轉而成為身在其中，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相當親暱的空間，而此取徑的地景研究，可以在新文化地理學的「觀看的方式」之外，讓研究者挖掘人們在日常生活規律中逐漸形塑的地景。作為與河水關係親近的空間，以及基於防洪需求的限制發展區，社子島在過去以及今日的居民有獨特的日常生活，而這些其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形，需要以此更貼近與親暱的途徑探索。

四、小結

歷經近一個世紀的發展，人文地理學的地景視角，在不同的學派中，有不同的意義與使用方式。儘管如此，Matless（2003）強調，地景具備其物質/意識形態、客觀/主觀等二元的性質，但這些看似分離、對立的兩者之間，是緊密連結、相互影響的，而地景觀點穿梭在「物質/意識形態」、「自然/文化」、「日常生活/再現」之間，可以連結緊密相連卻看似分離之領域之間的討論。Wylie（2007：1）則指出「地景即張力（landscape is tension）」，強調地景的二元性及其關係，使其具有「所見（the eye）/土地（the land）」、「親暱（proximity）/疏遠（distance）」

的對立、矛盾與拉扯，而可以用以探討身處在人同位置的人們，與一個空間產生不同的關係。



因此，地景研究可以讓人們瞭解一個地方的物質力量與論述力量如何交互作用，而產生當地發展的動態力量，並進一步影響、改變人與環境的關係。Besky (2014) 指出，地景一方面是穩定的、人們觀看的世界，另一方面也是動態的、人們棲居其中的世界，而人們對地景的概念與相關經驗，往往與政治、經濟或社會目的之地景歷史與意義的創造、改變有所關聯，並成為生產各種地方的動力。社子島堤防與水岸，曾是居民們相當重要的生活空間，而在晚近成為綠美化措施的實施地點；受到防洪計畫指定為「洪氾區」的社子島，今日同時也是約 1 萬名居民的家園，在臺北都市發展的推力之下，近年也成為都市治理者與規劃者試圖予以「整頓」、「開發」的地方，是不同人們在資源與意義之爭奪的焦點。換句話說，作為「觀看的方式」或地景與「日常生活」兩者之間，並非沒有交集的平行線，相反的，這同時存在的兩股力量之間具有動態的張力，這個動態的張力，同時也是推動社子島未來發展的力量。因此，穿梭於「再現」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地景取徑，助於研究者來回於觀看的地景與日常生活的地景兩者之間，探討這兩者的內涵與彼此的關係，而理解推動這引領地景之發展的張力。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文以社子島為研究區域，討論防洪基礎建設與都市發展的關係，涉及堤防與社子島土地性質、土地使用的關係，以及與防洪建設地景相關的再現（representation）與「日常生活」，而針對不同研究問題，有各對應的研究方法。在介紹本文的研究背景並回顧相關文獻之後，本章將依序交代我的研究區域、研究方法，以及我在田野的位置和本文的研究限制。我為期近兩年的田野工作自2018年底展開，範圍包括社子島各大聚落，以及社子島人工濕地等堤防綠美化措施的據點。我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口述歷史、文本分析、訪談、參與式觀察等。由於本文的研究方法緊扣著研究問題與章節安排，因此下文將以研究問題為主軸，說明各個研究問題對應的研究方法。在本章最後，我也會說明研究者在田野之中的位置，以及本文的研究限制，這兩者之間是彼此相關的。

一、研究區介紹

本文的研究區域為隸屬於臺北市士林區的社子島。隨著基隆河改道工程、防洪基礎建設的興建，所謂「社子島」的區域，在不同的背景之下，指涉的範圍有所不同。廣義的「社子島」，除了延平北路七段至九段之外，尚包括位於延平北路五段的「葫蘆堵」與延平北路六段的「社子」地區，因第一次基隆河截彎取直工程而與葫蘆堵分離的「後港墘」，有時也會被視為社子島的一部分（江聰明，2010）。至於在本研究中的社子島，指的是由延平北路七段、八段與九段貫穿，位於社子堤防與渡頭堤防保護範圍的區域。



社子島包含福安、富洲兩個里，在近 20 年間人口維持在 1 萬至 1.1 萬區間（臺北市政府，2016）。社子島的產業活動以農業、製造業為主，以土地利用而言，農業至今仍是社子島主要的產業活動，農耕土地面積達 170 公頃土地，佔全區面積近六成（臺北市政府，2016）。跟據臺北市政府在 2015 年進行的調查，社子島共有 377 戶農戶，約七成農戶的耕地面積在 1 ~ 2 分之間，這些農戶的作物以蔬菜為最大宗，他們生產的作物主要批發至環南、濱江市場，或到士林、社子市場零售（臺北市政府，2016）。另外，社子島有近 280 家工廠，其中幾乎全數為未登記工廠，這些工廠以金屬加工、紙與紙製品加工製造、印刷為主（臺北市政府，2016）。社子島的工廠與農地彼此錯落，再加上幾個傳統聚落，而形成農地與工廠並立的地景。2015 年，柯文哲主政的臺北市政府提出「生態社子島」計畫案，計畫以全區區段徵收的方式開發社子島，截至 2021 年 2 月為止，已通過主要計畫、細部計畫，目前正在進行二階環評以及區段徵收作業的準備程序（臺北市政府，2021）。

社子島有包括位於延平北路七段的「溪洲底」、延平北路八段的「溪沙尾」、延平北路九段的「浮洲」以及位於基隆河側，坐落在延平北路八段 2 巷尾端的「浮洲」等四大聚落⁴。為了使本文歷史經驗與觀點更全面，本研究的報導人已涵蓋出身或居住在這四大聚落的居民（報導人資料整理於表 1）。另外，為了討論堤防地景在綠美化措施下的新功能與意義，位於基隆河側新舊堤防之間的「社子島濕地」也是本研究的田野地點。

⁴ 溪洲底可再細分為「塏寮」、「中窟」、「戲台口」、「下竹圍」；溪沙尾可細分為「頂溪沙尾」、「下溪沙尾」；浮洲亦可細分為「頂浮洲」、「下浮洲」，這幾個小聚落加上浮洲，即是所謂社子島的「九大聚落」。然而，有報導人提到此「九大聚落」的概念並非源自社子島在地，而是臺北市政府的「發明」，而回頭過來成為部分社子島人士對於傳統聚落的概括指涉。

表 1 報導人資料表

報導人（皆為假名）	報導人身分	訪談日期
王開元	浮洲居民、菜農	2018/11/7、2019/6/9、 2020/2/21
王樹群	浮洲居民、社子島自救會 成員	2020/6/8、2020/7/21、 2020/9/14
李演世	溪沙尾居民、印刷業者	2020/7/23
楊玉枝	溪洲底居民	2019/1/28、2020/4/16
林老師	溪沙尾居民、社區發展協 會成員	2019/9/16、2020/2/11
謝大姐	溪洲底出身、社區發展協 會幹部、在地議員助理	2019/7/24、2020/7/9
李玉釵	浮汕出身、社子島濕地志 工	2019/6/30、2019/7/10
王忠興	浮洲居民、工廠主	2020/2/17、2020/6/25
江淑華	浮汕居民、工廠資深主管	2020/2/17
陳建築師	社子島濕地設計者	2020/2/19
陳天興	浮洲居民、菜農	2020/2/22
王文寬	浮洲居民、菜農	2018/11/7
陳崇光	浮汕居民、自由業者	2020/10/5
許又君	浮汕居民、學校志工	2020/10/5
鄭逢春	溪沙尾居民、工廠退休、 社子島自救會成員	2020/9/14
陳志德	溪洲底居民、船屋主人、 捕蟹人	2020/10/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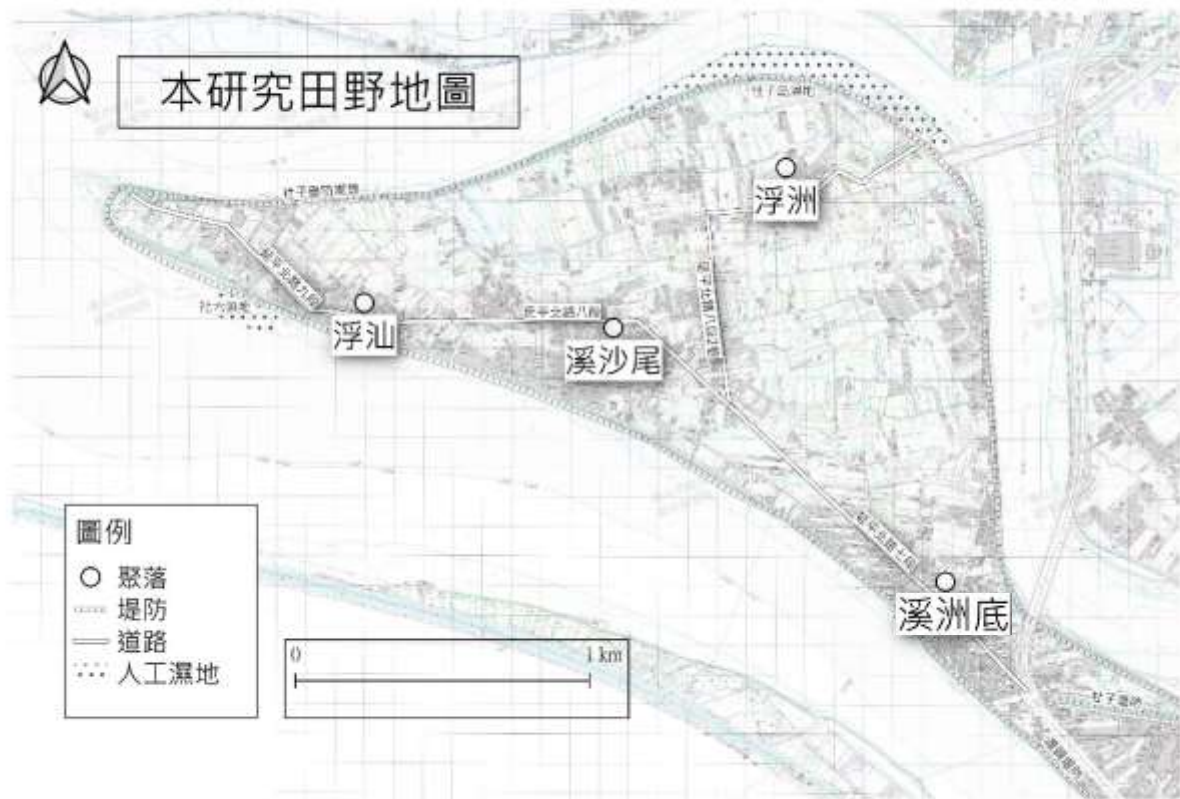


圖 2 本研究田野地圖

資料來源：作者以臺北市政府都發局（2012）地形圖為底圖改繪

二、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口述歷史、文本分析、訪談與參與式觀察，這些研究方法對應本文的四個研究提問，以理解堤防地景的變遷與張力，並進一步探討防洪基礎建設與都市發展的關係，以及作為「觀看的方式」的地景與

「日常生活」的連結。對於如何運用這些研究方法以回應研究提問，我的具體說明如下：



(一) 基礎建設地景的變遷：文獻分析與口述歷史

本研究的第一個問題，是討論社子島堤防地景的歷史變遷，與社子島土地性質、土地使用與日常生活的關係。對此問題，我擬藉由文獻分析與口述歷史需要的資料。Schein (2010) 建議研究地景可以從爬梳地景相關的材料開始，這些材料包括所有有助於建構地景歷史與意義的素材。為了理解社子島堤防地景的變遷，我所引用的文獻，包括臺北市工務統計年報、聯合報、經濟部公告的防洪計畫書等。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為防洪基礎建設的主管機關，該局出版的臺北市工務統計年報，刊載臺北市政府推動防洪建設的情形。至於聯合報對社子島堤防建設的過程、社子島居民在歷次洪患後對築堤的請願、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回應等，皆有所報導，對於了解堤防建設的歷史及政治過程相當有幫助。

此外，為了更深入瞭解堤防等防洪基礎建設與土地使用、日常生活的關係，我也使用「口述歷史」研究法，以得知防洪建設如何改變居民的日常生活。口述歷史是透過訪談受訪者以重建歷史的研究法，George and Stratford (2016) 指出，這種研究法能協助人文地理學研究者理解地景過去的圖像，並進一步掌握居民對環境改變的見證。此外，口述歷史也能保存社會相對弱勢、邊緣者或其他較無法出現在成文史料之人們的生命經驗（臺灣口述歷史協會，2013）。我使用口述歷史法，訪談社子島各聚落的居民，瞭解社子島的防洪基礎建設如何在不同階段改變他們的生活。




(二) 基礎建設的再現：文本分析與訪談

本文的第二與第三個研究問題，分別討論社子島堤防地景在各種文本中的論述與再現，以及綠美化措施帶給社子島堤防地景的新意義。這兩個研究問題皆屬於所謂「新文化地理學」將地景視為「觀看的方式 (ways of seeing)」的範疇，因此採取文本分析為主，並輔以訪談研究方法。對人文地理學與地景研究而言，文本分析是透過包括文學作品、新聞報導、圖像或地景本身等可以被閱讀的素材對空間之再現的討論，研究者透過解讀文本對空間的想像，以及分析文本與地景的關係，可以重新理解地景的建構過程及其權力關係 (Shurmer-Smith 2002)。而本文選定的分析文本，包括自然文學作家劉克襄造訪社子島之後寫下的〈台北的尾巴〉、電視新聞報導以及楊麗玲於 2016 年出版的《社子島！囚禁半世紀，被遺忘的孤島》、《看不見的島》的導演楊力州的訪談等，這些文本皆從外來者的觀點觀看、再現社子島，且皆對社子島與臺北都會的堤防地景有所著墨，而對於建構社子島的空間想像有重要的影響力。此外，為了瞭解社子島堤防近年來的綠美化措施如何帶給社子島地景新的意義，我也訪談參與堤階綠化認養、人工濕地營造等綠美化措施的社區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建築師等人物，藉此理解這些綠美化措施的實施目的、營造過程與設計理念，以作為進一步分析這些地景意義的基礎。

(三) 基礎建設與日常生活：訪談與參與式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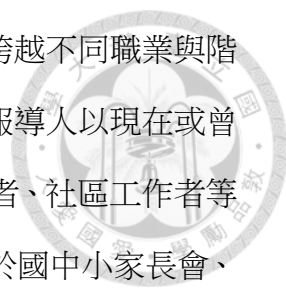
本文的最後一個研究問題，聚焦在社子島堤防地景的日常生活，用 Wylie (2007) 的話來說，是屬於人們親暱 (proximity)、沉浸 (immersion) 而居住其中 (living in) 的地景。有別於作為「觀看的方式」的地景得以透過文本分析來理



解，日常生活較適合以參與式觀察的方式來掌握。參與式觀察法，分為「參與」與「觀察」兩部分，研究者透過進入、參與特定社群的生活節奏，以近距離而沉浸其中的方式觀察、記錄田野中的人物事情，來理解這特定社群之人們（Cook 2005）。在實際操作上，我以水利處生態志工的身分參與社子島人工濕地的棲地維護與環境教育活動，以觀察社子島出身的居民，如何透過擔任社子島人工濕地志工，體現其身為社子島的認同，在服務的過程中與地景共同創造的意義。此外，我也參與浮洲與浮汕兩聚落分別在農曆 5 月 5 日與 5 月 7 日的划龍舟祭江活動，來觀察這以水仙尊王為軸心的年例祭儀，反映了什麼樣的人與水的關係，對於聚落的人們而言又有什麼樣的意義。最後，我也多次參與幾位社子島居民的日常活動，來觀察來理解社子島堤防地景的日常生活之外，並訪談幾位居住在不同聚落的社子島居民，其中包括相對弱勢、邊緣者，來瞭解防洪基礎建設在他們的生活之中的角色。

三、研究者的位置與限制

我在社子島的田野過程中的位置與身分歷經多次轉換，在踏入社子島之初，在揭露研究者身分的同時，也以「食農教育小老師」的身分，進入富洲里的社區發展協會與福安國中合作的園圃課程；此外，我的田野期間正值生態社子島開發案爭議，期間與社子島自救會的多次接觸，而以「關心社子島的年輕人」之姿進入當地社群；至於針對綠美化措施與划龍舟祭江民俗活動的研究，則分別用愛好生態與文化的愛好者的身分進行參與式觀察。整體而言，在田野中，我是以「關心社子島的外地年輕讀書人」這樣的面貌呈現自我。如此的身分，雖然賦予我進入田野中各種場域的彈性，卻也意味著有一些限制。



首先，雖然已試圖透過各種人際網絡，接觸涵蓋各聚落、跨越不同職業與階級、具有不同立場的報導人，但我仍注意到，本文相對多數的報導人以現在或曾經活躍於社子島公共事務者為主：他們現在或曾經擔政治工作者、社區工作者等職務，或在反對/支持生態社子島開發案的團體擔任要角，或參於國中小家長會、公共廟宇等具有公共性質之社群活動。這些報導人相對其他居民而言，較擅長「外來者」接觸、訴說他們的經驗與意見，相較之下，對於「公共」事務較少參與者，也有自身的生命經驗或想法，但我對這些經驗或想法的掌握則相當有限。雖然我得以從這些報導人的口中，聽到他們的故事，但恐怕有更為「後臺」的資訊是我未能在社子島的田野工作中得知的。

其次，由於研究期間正值「生態社子島」開發計畫討論的階段，我的研究議題顯得敏感。部分報導人與報導人之間，不僅有理念上的衝突，在利益上有難以妥協的矛盾，身為一位「關心社子島的外地讀書人」，也難以擺脫特定立場的標籤，這也可能影響了部分報導人在面對研究者時所皆露的資訊內容。最後，我在田野過程中所獲得的資訊，其中包含較隱晦、曖昧或難以公開的「秘密」，基於報導人的要求或是保護報導人的考量，不便在本文中完全呈現，這也是本文的一項限制。以上是本文的研究限制，謹在此交代。

第四章 從沙洲到「洪氾區」：都市防洪建設與社子島的變遷



近年都市研究者注意到所謂「都市化」影響所及，已超過人們依照行政區劃、聚落分布等基準認知的都市的範圍，而對人與非人環境而言，也涉及到超越傳統都市界線範圍的轉換(Brenner and Schmid 2015; 江欣樺、王志弘與黃若慈 2018)。維繫都市基能之運作，在空間範圍穿越城市界線的基礎建設，是瞭解都市化過程以及人與非人環境關係轉變的焦點(Angelo and Wachsmuth 2014; Conolly 2019; Tzaninis et al. in press)。

臺北都會的發展，可以追溯到 1709 年由泉州籍漢人移民組成的「陳賴章墾號」大舉開墾臺北盆地開始(李進億與楊蓮福，2005)。隨著農墾社會的成形以及航運貿易的發展，艋舺、大稻埕兩市街先後興起，加上清末臺北設府而新建的「城內」，形成所謂「三市街」的格局，這三個市街於日治時期擴張，並透過殖民政府的治理技術，逐漸整合為一個都市(蘇碩斌，2015)。戰後臺北仍維持臺灣首都的地位，與鄰近的新北市、基隆市形成有七百多萬人口的大都會(江欣樺、王志弘與黃若慈，2018)。在臺北都會逐漸「都市化」的過程之中，位於都市相對外圍區域、受到「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影響的社子島，究竟如何受到都市力量影響？其土地使用與日常生活又歷經哪些轉變呢？

一、河中浮現的沙洲

今日新聞媒體、政府機關與一般民眾稱作「社子島」的區域，是位於基淡水河與基隆河之交的半島，其位於社子堤防與渡頭堤防之外的空間，範圍涵蓋士林區福安里、富洲里全境，並包括溪洲底、溪沙尾、浮汕、浮洲等歷史可追溯至日


治時期之前的聚落。1970 年經濟部公告的《臺北地區防洪計劃檢討報告》做出對社子島不予築堤保護的決定，並於同年臺北市政府公告的《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要計畫案》將社子島列為禁建的「限制發展區」，影響社子島的發展，而這個過程與社子島的土地性質以及臺北都會防洪建設緊密聯結（經濟部，2010）。

（一）社子島沙洲的形成

1697 年時，清帝國的官員郁永河為了採硫磺來臺，經水路由關渡隘口進入臺北盆地時，他所見的是寬廣的大湖的景象；除了郁永河所著的《裨海紀遊》之外，康熙（1662 - 1772）至雍正（1723 - 1735）年間的幾幅的臺北地圖，也不見今日社子島的蹤影（王志文，2007a、2007b）。後來，臺北附近的山區火耕農業、漢人為了製作樟腦而砍伐林木，或將林地開墾為茶園等事業，加速上游河川的侵蝕作用，使得泥沙堆積於河幅廣大的淡水河、基隆河的匯流處，在 1694 年陷落於水中的區域，逐漸出現於水面之上（王志文，2007a、2007b）。社子島的沙洲於乾隆（1736 - 1795）、嘉慶（1796 - 1820）年間逐漸浮現，分別在乾隆、嘉慶年間的〈臺灣輿圖〉與同治（1862 - 1874）年間的〈淡水廳志圖〉中，在基隆河與淡水河的匯流處先後出現名為「浪泵洲」、「草洲」與「鹹草埔」的沙洲，此沙洲在漢人大舉入墾以前，為凱達格蘭族的大浪泵社、毛少翁社、北投社所有（王志文，2007a、2007b）。

1754 年的地震使得社子島一帶的沙洲再次陷落，大多數的平埔族的人遷居地地⁵（西岡英夫，2001〔1933〕）。至於溪洲底、溪沙尾、浮汕、浮洲等漢人聚落則大約於清朝光緒（1875 - 1908）年間以前逐漸形成，這些聚落為祖籍同安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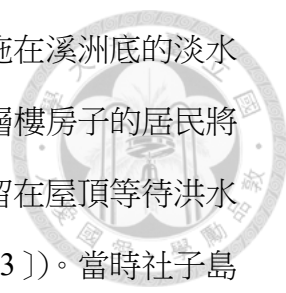
⁵ 根據西岡英夫（2001〔1933〕）的紀錄，1933 年時，社子島只有一戶居民被歸類為漢化程度較高的「熟番」。



的漢人移民，從蘆洲、八里、大龍峒等地前往開墾而組成，或直接從中國大陸渡海後落腳（王志文，2004）。早期社子島尚未形成一個整體，而是各自獨立的數個沙洲，而聚落之間壁壘分明，彼此並不時常往來，反而與移出地的連結較深，這反映在蘆洲保佑宮、保和宮以其各姓祖宗會、神明會的祭祀活動的範圍橫跨淡水河兩地，而社子與蘆洲地區有所謂「蘆社一家親」的說法，卻少有以社子島全境為範圍的祭祀圈存在（王志文，2004；李進億與楊蓮福，2005）。至於在行政區劃上，清領時期與日治時期初期，社子島的浮汕與溪洲底分別屬於不同的次級行政區，浮汕與蘆洲被劃分為同一個次級行政區之下，直到 1920 年之後，社子才完全劃分為士林街的轄區，而與蘆洲、三重分離。此歷史除了反映社子島早期與蘆洲的緊密聯繫外，也凸顯其的地形破碎、聚落分散的現實（王志文，2004；李進億與楊蓮福，2005）。

（二）浮動的沙洲

社子島早期的土地性質並不穩定，其土地容易受到河水改道或洪水影響而改變。由於社子島早期文獻缺乏，西岡英夫在 1933 年造訪社子島，並於《台灣時報》發表之〈浮洲村落「社子」：鄰近島都的特殊村落之鄉土觀察記〉一文，是今日人們理解社子島早期地理環境的重要文獻。西岡英夫指出，社子島的土地「雖面積廣袤，被兩支河流所支配，或被淹沒，獲新生而增減」（西岡英夫，2001〔1933〕：255）。社子島的土地容易受到洪水而改變，隨著洪水引起的河水改道，也改變社子島與周圍陸地的關係。經歷過幾次變遷，根據西岡英夫的紀錄，在道光年間（1820 - 1850）的幾次洪水，使得葫蘆堵與社子、後港墘及社子島相連再一起，而與大龍峒一帶分離（西岡英夫，2001〔1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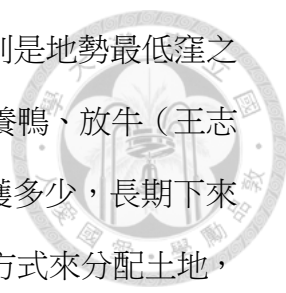


西岡英夫也提到，由於在這個時期社子島的護岸工程僅實施在溪洲底的淡水河側一帶，且難以阻擋較強的洪水，當大洪水發生時時，有二層樓房子的居民將家具、財物放上二樓，並到二樓避難；僅有一層樓的人，只能留在屋頂等待洪水退去，或者划船到有二樓的屋子裡避難（西岡英夫，2001〔1933〕）。當時社子島的產業以農業為主，主要作物為稻米與蔬菜，其中稻田集中於地勢較低的淡水河側，菜園則多臨著基隆河，這些作物收成後，會經水路運往市區販售。除了稻米與蔬菜之外，社子島早期也種植茉莉、黃枝、秀英等香花作物，以供應大稻埕的茶葉市場（西岡英夫，2001〔1933〕）。

（三）與水相連的土地使用與日常生活


相對不穩定的土地性質以及經常氾濫的洪水，在沒有堤防的時代，對社子島的土地使用與日常生活有著深切的影響。例如，臨基隆河側的居民，會透過在田邊種植鹹草來鞏固河岸，除了穩固土壤防止遭受沖刷、防止鹽分入侵，並可固定上游流下來的泥沙，增加可耕地的面積（王志文，2007a、2007b）。這種工法稱作「塹田」，在溪洲底靠近基隆河側的聚落，至今仍然留下「塹寮」的地名（王志文，2007a、2007b）。

另外，在浮汕的尾端，即今日延平北路九段一帶的區域的「李復發號七十股公產」土地管理機制，則是因應社子島早期不穩定之土地性質的例證。「李復發號七十股公產」為兌山李家所有，兌山李家來自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仁德里，在18世紀中期到三重、蘆洲開墾，並於19世紀末進入在社子島，而於浮汕成立李復發號七十股公產。該公產將浮汕的農地分做七大股管理，七大股又細分為十股，故稱做「七十股公產」。這些土地由上游往下游又分為「實畑」、「上帖」與「下帖」等三大類別（王志文，2004）。其中，「實畑」位於地勢較高之處，而「上帖」



則位於感潮地帶，土壤鹽分較高，相對不利耕種，而「下帖」則是地勢最低窪之處，生產力最低，僅能種花生、番薯，最末端的部分甚至僅能養鴨、放牛（王志文，2004）。由於兌山李家的族人擔心耕作地勢的高低影響收穫多少，長期下來造成「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後果，而採取 10 年重新抽籤的方式來分配土地，並因應臨河的土地時常因洪水而流失，有流失土地互補的機制（王志文，2004）。歷經清帝國、日本殖民以及國府的統治，雖然七十股公產的法律地位有所先後更動，但直到 1964 年「臺北地區防洪治本計畫第一期實施方案」拓寬關渡河口與浚渫社子島頭的土地使得部分「下帖」的土地沒入水中、1966 年因臺北海專在浮洲設立而出售土地，此共同耕作土地的機制才畫下句點（台灣省台北地區防洪治本計畫執行委員會，1968；王志文，2004）。1951 年時，李復發號的幾位地方頭人向陽明山管理局提出的〈不可分割申請書〉提到「該土地因屢遭水患，地形時常變更，為預防水患，與顧及人人有地可耕起見，實不可能分割」，正說明了該公產與社子島早期土地性質不穩定的關聯，是社子島的兌山李家為了克服、順應洪水與多變的地形而出現的土地管理機制（王志文，2004：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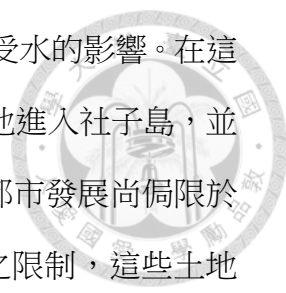
雖然早期政府沒有在社子島建造堤防，但社子島並非完全沒有防洪建設，但這防洪建設並非由政府所建，而是地方人士自行打造。除了前述用鹹草鞏固堤岸的「塹田」之外，住在浮洲的菜農陳天興回憶到，在沒有水泥堤防的時代，為了避免基隆河的洪水氾濫，浮洲的居民們會在洪水季時，在農田排成一列用鋤頭挖土，將土堆成土圍來阻擋洪水，但這種自行堆置的土圍並不堅固，一發現有裂縫就必須趕緊修補，否則整個土圍就會坍塌，導致整片菜園被水淹沒。除了基隆河側的浮洲聚落的居民會自力以土築堤，淡水河側居民的也有類似的作法。1950 年代出生的溪沙尾居民李演文在小時候曾跟家中族人一起挖土打造土圍的經驗，他提到，這種土圍跟目前的堤防相比非常脆弱，家中長輩曾講這種土圍在大洪水時「撐不過兩個潮汐」就會坍塌，仍無法阻止河水進到菜園（訪談李演文，2020/7/23）。



在 1939 年連結後港與土林的士林吊橋、1960 年基隆河上的中正橋、1955 年連結葫蘆堵與大龍峒的延平橋興建之前，社子地區的對外交通必須仰賴水路，社子島有多個渡口，居民與農作物可從這些渡口搭乘渡船，通往士林、大龍峒、八里、關渡、蘆洲等地（陳鴻筠，2019）。出生於 1936 年、居住在溪洲底的楊玉枝提到，早年她會跟家中長輩一起種植高麗菜、白菜、番薯等作物，這些蔬菜收成後放到籃子裡，再用扁擔挑著走到河邊的渡船頭搭乘人力渡船，前往位於臺北大橋的太平市場販賣。社子島的居民透過水路將蔬菜運往臺北市中心，載著水肥的「大肥船」也可以從水路運往社子島，甚至可以在滿潮時直接經過圳溝駛進菜園旁，卸下水肥並販售給農戶使用。

除了交通仰賴水路之外，由於沒有堤防阻隔水與土地，在地居民的生活跟水的關係非常親密，水岸空間可說是住家生活空間的延伸。不少較年長的居民回憶到，他們年幼時常到河邊洗衣服、洗菜，洗著洗著，腳底之下感覺到突出的東西，撈起來一看，就是可以加菜的蛤蜊；有時候，要煮飯時發現今天的菜不夠，也會到河邊去抓一些蛤蜊、捕魚來吃，但此種生活方式隨著堤防建設阻隔了人與水、上游水庫建造興 1980 年代淡水河抽沙造成淡水河的河岸逐漸從沙岸轉變成泥岸而消失。另外，在延平北路八段 242 巷一帶，曾有個人們稱作「崩空」的窪地，該處易受到潮汐影響，於滿潮時會淹入水中，潮位較低時才能通行。浮汕出身、曾就讀位在溪沙尾之富安國小的李玉釵指出，在水位較高的日子，學校還需要配合潮汐的時間上學、放學，否則學生就難以平安來往學校與家中。不論是對水路交通的依賴、在濱水空間的生活經驗，或者必須配合潮汐的生活節奏，都反映了早期社子島日常生活與水緊密相連的特質。


透過檢視堤防建起之前社子島之土地性質、土地使用與日常生活，本文注意到基隆河、淡水河與社子島土地與社會之緊密的聯繫，從其多變的土地性質、居



民與水共生而仰賴水運的生活方式觀之，早期的社子島確實深受水的影響。在這段時間，漢人移民陸續從蘆洲、三重、大龍峒、八里、關渡等地進入社子島，並建立了溪洲底、溪沙尾、浮汕、浮洲等聚落。由於當時臺北的都市發展尚侷限於艋舺、大稻埕與城內等「三市街」，加上其不穩定的土地性質之限制，這些土地受都市力量的影響較有限，特別是地勢最低處的浮汕，出現因應經常洪水之「李復發號七十股公產」的土地共有制度，顯現其不穩定的土地難以測量、圈地，而難以進入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土地市場的特質。在接下來的章節，本文將討論社子島在限建之下的築堤過程，以及築堤對社子島之人水關係的影響。

二、限建之下的築堤

在日本殖民初期，臺灣總督府已有淡水河流域之防洪與治水計畫，包括在流域上游，以「植樹」與「土砂防止」為主的「森林治水事業」，以及中、下游之堤防與護岸之修築，而由於都市發展尚集中於右岸，這些防洪基礎建設的設置也以右岸為主，且集中在艋舺、大稻埕、與城內等「三市街」，如 1899 年興建的河溝頭堤防、大稻埕護岸，以及 1913 年興建之淡水河擁壁堤防等（溫振華與戴寶村，1998；簡佑丞，2019）。當時的社子島則沒有堤防建設，其防洪工事以護岸為主，其淡水河側的「溪洲底護岸」，在 1933 年興建，並於 1938 年、1942 年、1948 年、1949 年有修補或重建之紀錄；基隆河側的護岸，則修築於 1937 年，並在 1939 年、1940 年有修補或重建之紀錄（鄭政誠，1996）。幾位較年長的居民指出，溪洲底護岸的保護強度並不高，其主要目的是保護岸邊土地免於遭洪水侵蝕，而無法阻擋強度較高的外水淹沒土地，若大雨逢初一、十五的大潮，外水仍時常淹入社子島。




戰後初期，臺灣省政府水利局開始著手規劃臺北地區的防洪建設。1963 年水利局實施「臺北地區防洪治標計畫」，進行河川障礙物清除、河槽疏導、川端堤防與馬場町堤防增強、市區內下水道等建設，這些建設集中在臺北市、中永和與新店地區（臺灣省水利局，1965）。隔年臺灣省水利局成立「防洪治本計畫工作處」，並採納美國陸軍工程師團（United State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之建議，以「200 年洪水重現期距」為臺北地區防洪保護強度，並於 1964 年執行「第一期實施方案」工程，其中與社子島直接相關的項目，包括基隆河改道工程、關渡隘口拓寬、社子島北端浚渫等（台灣省台北地區防洪治本計畫執行委員會，1968）。此外，「第一期實施方案」分別沿淡水河與基隆河興建渡頭堤防與社子堤防，以保護延平北路五段的葫蘆堵與延平北路六段的社子區域，使得七段至九段成為臺北的「堤外」地區（台灣省台北地區防洪治本計畫執行委員會，1968）。

1970 年經濟部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公告《臺北地區防洪計畫檢討報告》，指出社子島「地勢低窪，排水問題亦不易解決，目前情形經濟評價殊低。將來若實施浚渫，可利用浚渫之土壤高後，再行興建護岸保護，目前宜以非工程方法處理」（經濟部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1970：89），並將社子島劃設為「洪氾區」，而確認社子島為堤外地區的狀態。同年臺北市政府公告的《陽明山管理局轄區主要計畫案》，則將社子島劃為「限制發展區」，不得興建新的建築（臺北市政府，1970）。1973 年經濟部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提出《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也未予社子島築堤保護（經濟部，2010）。

雖然《臺北地區防洪計畫檢討報告》與《臺北地區防洪計畫建議方案》皆未對社子島規劃築堤保護，但由於行政院尚未核定「臺北地區防洪計畫」，社子島的堤防建設仍於 1970 年代展開。1973 年 8 月 28 日，臺北市長張豐緒與工務局長張孔容等人赴社子島視察，瞭解浮洲一帶的農田受到潮水淹沒而帶來的損失情

形後，便決定在社子島興建防潮堤，以保護當地的農作（聯合報訊，1973/8/29）。其中，淡水河側的防潮堤於 1974 年修築完成，而基隆河側的防潮堤，則於 1975 年完工（聯合報訊，1975/3/15）。此時社子島防潮堤的平均高度為 2.5 公尺（經濟部，2010）。1977 時，為了配合年配合關渡、洲美防潮堤的興建，臺北市政府將堤防的平均高度提升為 3.7 ~ 4 公尺，達到約相當於 5 年洪水重現期的標準（聯合報台北訊，1977/12/11；臺北市政府，1991；經濟部，2010）。

行政院於 1979 年核定臺北地區防洪計畫的初期實施計畫，隨著淡水河對岸之三重、蘆洲堤防之興建，及在 1987 年完全加高至 200 年洪水重限期距保護強度，使得社子島承受洪水的風險相對提高（經濟部，2010）。在地民意代表、地方頭人與居民開始積極向臺北市政府陳情，要求也加高社子島防潮堤的高度（謝梅華，2008；經濟部，2010）。臺北市政府委託行政院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試驗，結果指出社子島堤防增高可降低洪峰時的水位，臺北市政府因此在 1985、1886 年兩度函請行政院，要求加高社子島的堤防，行政院卻回覆臺北市政府，指出身為洪氾區的社子島，其堤防已經有相當於 5 年洪水重現期保護強度的堤防，不應再加高（謝梅華，2008）。1987 年，社子島的里長們帶頭成立「社子島自救委員會」，並於隔年 3 月至 8 月間，以每月兩次的頻率租遊覽車，前往臺北市政府、經濟部或行政院抗議，要求增高社子島防潮堤的高度與強度（謝梅華，2008）。行政院最後於 11 月核定「社子島築堤保護案」，將社子島防潮堤的平均高度由 4 公尺加高為 6 公尺，以達到相當於「20 年洪水重現期」的保護強度，但仍然維持社子島的發展限制，並要求未來不得再增高堤防（經濟部，2010）。1989 年 8 月，社子島防潮堤加高工程正式動工，淡水河側堤防於 1994 年完成，基隆河側的堤防工程持續至 1997 年 8 月才完工（秦富珍，1994/11/7；楊金嚴，1997/8/6）。



儘管加高之後的堤防能抵擋基隆河、淡水河之外水的入侵，由於社子島地勢較低且欠缺雨水下水道系統，逢大雨時仍時常有積淹水的情形（聯合報，1994/10/11）。1996年，臺北市政府緊急設置8座臨時抽水站，才減緩社子島因內水而淹水的情形（聯合報，1996/8/7）。社子島的臨時抽水站日後有所新增，截至2019年底，臺北市共有21座臨時抽水站，其中有15座位於社子島（臺北市政府工務局，2020）。

從《臺北地區防洪治本計畫》、《臺北地區防洪計劃檢討報告》到《臺北地區防洪計畫》，200年洪水重現期的高保護範圍，從臺北市、三重市，擴張到蘆洲、新莊等地，卻留下社子島於此高保護範圍之外。而社子島在地方居民、民意代表，以及臺北市政府的爭取之下，獲得了較低強度的洪水保護。儘管社子島與臺北其他區域的洪水保護呈現顯著的差距，但此強度之下的防洪基礎建設，也讓社子島的土地開展不同使用的基礎，讓這個曾經是沙洲的半島有更多發展的可能性。

三、「洪氾區」之後

在社子島防潮堤的平均高度增加至6公尺後，臺北市政府曾於1993年發布《擬（修）訂社子島地區主要計畫案》，擬以「低密度」的方式開發社子島，將社子島規劃為住宅區、農業區與水岸發展區，卻遭到部分民意反對而終止，而未公告細部計畫（臺北市政府，2016）。其後多位臺北市長任內，皆曾計劃有開發社子島，卻因高保護範圍爭議、防洪計畫尚未修正完成、環境影響評估未通過等因素而未實施（臺北市政府，2016）。至於柯文哲市長任內臺北市政府提出所謂「生態社子島」開發計畫，已於2018年、2020年分別通過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截至2021年1月，仍有環境影響評估、區段徵收計畫等程序尚未完成；「臺北地區防洪計畫」雖然已於2010年、2019年兩度修正，計畫將社子島堤防加高、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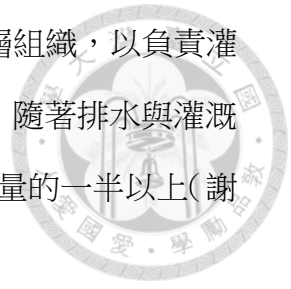
土以納入高保護範圍，但仍有蘆洲、三重垃圾山清除、關渡平原高保護設施退縮、五股疏左地區堤防增高等條件尚未完成（經濟部，2010、2019）。但是，具備 6 公尺高防潮堤、20 年洪水重現期保護強度的社子島，也配合臺北都會的發展，有了不一樣的土地使用。在產業方面，先後有蔬菜專業區、鐵皮屋工廠的興起，並出現了多元的住家形式，是臺北都會區中的一個獨特的區域。

（一）蔬菜專業區與農業的興衰

在 1970 年代初期，社子島共有 878 戶農戶，每日生產約 50 噸至 100 噸的蔬菜，主要供應臺北市的蔬菜市場，是臺北市重要的蔬菜供應地。但由於社子島地勢較低，部分地區的標高僅 0.5 公尺至 1 公尺，且缺乏堤內排水系統，當逢滿潮時的大雨發生時，洪水極易淹沒農地，且入侵的水含有鹽分，使得農地不適合蔬菜耕種（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會史編纂小組，1993）。

因此，1975 年 7 月至 8 月間，臺北市政府建設局與七星農田水利會合作，進行「台北市社子地區農田灌溉排水系統調查」，藉由調查社子島的土質、水文、既有溝渠等資料，以規劃「社子蔬菜專業區」（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會史編纂小組，1993）。調查結束之後，由於七星農田水利會認為負擔費用太高，改由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接辦後續工重。其中灌溉、排水工程款共 2754 萬元，由臺北市政府負擔 1473 萬元，瑠公農田水利會負擔 1281 萬元（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會史編纂小組，1993）。工程至 1977 年底正式完成，內容包括以地下水為水源的噴灑灌溉系統，以及分為 6 個排水區域設置圳道的排水系統，其受益面積為 262.81 公頃（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會史編纂小組，1993）。社子蔬菜專業區並於 1976 年 7 月正式劃入瑠公農田水利會的事業範圍，該會並制定〈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社子蔬菜專業區灌溉排水管理要項〉，以管理專業區的灌溉與排水事

宜，同時設立社子工作站，成立 4 個水利小組與 15 個班的基層組織，以負責灌溉、排水業務（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會史編纂小組，1993）。隨著排水與灌溉設施的完成，社子島的蔬菜產量有所提升，一度佔臺北市市場總量的一半以上（謝梅華，2008）。




但是，在社子蔬菜專業區設立後，由於中山高速公路通車，臺灣中南部的蔬菜可以當天從產地抵達臺北，社子島的蔬菜產業由於成本較高而敵不過中南部的競爭，其蔬菜產業因此衰退。儘管如此，根據臺北市政府的統計，直到 2014 年，社子島仍有 170 公頃的土地為農耕使用，占了全社子島近六成的土地面積；目前社子島有農戶 377 戶，大多數農戶的耕作面積在 1 至 2 分之間（臺北市政府，2016）。社子島農人種植的蔬菜，有批發到屬於北農體系的第一果菜批發市場、第二果菜批發市場或位於蘆洲的大台北果菜市場者，也有零售至鄰近之社子市場、士林市場、大龍市場等零售市場的攤商者，除了送往批發與零售市場之外，亦有農民與餐廳業者合作，直接供應蔬菜給餐廳。



圖 3 近浮洲聚落的菜園與工廠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二）未登記工廠的興起



高速公路通車後，中南部的蔬菜可以即時供應臺北的市場，社子島的蔬菜競爭力下滑，蔬菜產業衰退，取而代之的則是鐵皮屋工廠的崛起。根據 1960 年的地形圖，當時社子島已有造船廠、鋼架廠、木工廠等工廠，但數量有限且集中在溪洲底一帶（陳鴻筠，2019）。1980 年代左右，社子島的工廠數量大幅增加，不少農地的地主在土地搭起鐵皮屋，而租給有需求的事業經營者當作廠房或倉庫使用，而出現物流、製冰、砂石、鞋業、廚具等不同類型的廠房（陳鴻筠，2019）。根據臺北市政府的調查，社子島有約 280 家工廠，除了其中 4 家，皆為未登記工廠。這些工廠以金屬製品製造、家具製造、機械設備製造、紙與印刷品製造為大宗（臺北市政府，2016）。此外，在最近幾年，社子島也出現一些廢棄物處理廠（陳鴻筠，2019）。

除了傳統產業外，社子島的這些鐵皮屋工廠也不乏技術門檻較高者，王忠群創立的忠興工業即是一個例子。生於 1951 年的王忠群是浮洲人，他 14 歲時成為車床學徒，學習車床技術，並兼習銑床、機械組裝、油壓等技術，而有鐵工廠、輪胎業、唱片製作、油壓等不同領域之工業的工作經驗，1980 年代初期自行創業在延平北路六段開設工廠，製造電線、電纜用線軸，客戶除了臺灣太平洋、大同電線電纜公司，也外銷到日本。隨著中國大陸工業興起，臺灣因成本較高而競爭力下滑，王忠群的工廠在 1990 年代初期遷回社子島的浮洲，並轉型製造可以供半導體晶圓、太陽能板切割的主輪（main roller），並自引進日本的包膠機台與技術，而能從主輪的包膠到開溝一貫作業，往來的客戶包括許多知名的半導體及太陽能大廠。



圖 4 忠興工業的作業員操作 CNC 電腦車床

資料來源： 作者拍攝



另外，印刷產業也是社子島相當重要的一環。一位從事印刷產業的報導人指出，1918 年士林紙廠設立後，士林一帶隨之出現印刷相關產業聚落；1970 年，士林紙業將生產重心轉往桃園新屋，部分印刷相關產業移至堤內的社子工業區。堤內的社子工業區的工廠，也在 1990 年代開始外移到社子島，除了印刷廠本身之外，還有包括耗材提供、上光、燙金、打凸等相關產業的協力廠商在社子島開設，而形成新北市中和區之外，臺北地區印刷相關產業的第二大產業聚落。

除了上述屬於製造業範疇的工廠之外，晚近幾年，社子島的鐵皮屋工廠也出現特技表演團體團練場、影劇攝影棚等非典型製造業的空間使用，而呈現相當多元的面貌（陳鴻筠，2019）。正是相對便宜的土地、較有彈性的土地使用，以及鄰近都會之區位等條件，使得社子島成為這些不同需求的鐵皮屋工廠使用者的選擇（陳鴻筠，2019）。由於社子島不是工業區，加上「限制發展區」的限制，在社子島開設工廠有些不同於其他地方的挑戰。至於水、電的申請，在 2016 年放寬限制之前，社子島的各工廠可以透連接既有建築之水、電來取得，而營利事業登

記、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等「廠房三照」的問題，則透過將廠房三照登記於堤內工業區的地址來解決。儘管因為土地非工業區，使得在申請政府獎勵時有較多限制，但在社子島經營工廠所遭遇的問題並不難克服。「我們還是有繳稅的，是一間合法的公司。」忠興工業的一位資深主管如是說（訪談江淑華，2020/2/17）。

（三）多元的居住與住家型式

由於從禁止合法興建房屋使得土地價值較低，地主早期社子島的土地價值較低，時常有佔有土地或佔用房屋的情形，或以口頭方式協議。而出現所謂「有屋無地」、「有地無屋」、「無屋無地」、「一屋多戶」等情形。居住在浮洲的王開元，便是屬於所謂「無屋無地」者，他目前居住在二層樓建築中的第二樓，該建築基地的土地早年便以相當低廉的價格賣給關渡的人士，據王開元所述，房子雖然是他的父親在 1975 年所建，卻不知為何登記在他人名下。另一種情形「無屋無地」出現的情形，則是與社子島的土地投資事業有關。有部分社子島本地或外地的不動產投資者，向原本的住戶買下住戶的土地、房屋而取得不動產的所有權，卻又以口頭或書面為契約，約定以免費或相當低廉的租金，提供原本的住戶住到因開發而徵收的那一天，而投資者本身則以取得徵收後的補償為目的。

從蔬菜專業區到未登記工廠的土地利用轉變以及社子島多元的住家形式，本文注意到，社子島的發展，並未因劃設為「洪氾區」而與臺北都會脫鉤；相對地，憑著其相對便宜、有使用彈性的土地與鄰近市場的區位，社子島的發展緊緊與整個都市的脈動連結，至於 6 米高的社子島防潮堤防、20 年洪水重現期的保護，是社子島之所以有是這些土地使用方式的基礎。



四、小結

歷經三百多年的發展，今日人們稱作社子島的區域，曾是臺北盆地周圍漢人移民開墾的前線，因為「臺北地區防洪計畫」的限制，成為高保護範圍之外的區域，出現較特殊的土地使用情形。儘管如此，社子島的發展並未時空凍結 1970 年，而是由於其相對低廉的土地價格、較有彈性的土地使用規範，以及鄰近都會的區位，而先後出現蔬菜專業區，以及由未登記工廠為主的非正式工業區；另一方面，社子島也因為土地價較低，早期土地權利僅口頭約定未予登記等原因，出現了「有屋無地」、「無屋無地」、「有地無屋」、「一屋多戶」等多元的住家形式。

在社子島發生人口增長、產業結構改變的背後，也牽涉到社子島土地性質的改變。社子島一開始為浮出水面的沙洲，在缺乏防洪基礎建設的時期，曾是浮動、不穩定而難以劃界的「濕地」，隨著堤防的建設，而有以蔬菜專業區、未登記工廠等土地使用。在這過程之中，阻隔了河水與土地，使得陸地不再隨著洪水而大幅變形的堤防，是社子島的土地之所以能進一步使用的基礎。因此，社子島的堤防可說是製造「陸地」的基礎建設 (Elden 2018; Kane 2018)。與之相同時間發生的，則是社子島從日常生活與水關係緊密的親水空間，轉換為排除外水的空間。

儘管如此，社子島的堤防建設與改建，受「臺北地區防洪計畫」限制，堤防加高為 6 公尺之後，便無法再行加高，直到目前為止，實質上仍排除在「200 年洪水重現期距」的高保護範圍之外。討論都市發展與非人環境關係的學者們指出，都市化的過程，伴隨著排除「洪水」的過程 (Kaika 2005; Elden 2018; Kane 2018)。在此觀點之下，社子島則是處於未完全排除「洪水」的中介狀態。這背後存在著「臺北都會」與「社子島」兩者的防洪基礎建設系統的衝突，並又因跨中央與地

方的行政關係，並因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防洪計畫、都市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區段徵收安置而難以撼動（謝梅華，2008；陳竑達，2011；陳鴻筠，2019）。



社子島曾是居民們過著與水關係親密之日常生活的地方，由於位於都市相對邊陲，早期土地價值較低等因素，中央政府以都會中心防洪安全的考量，將社子島劃設在高保護範圍之外的洪氾區，不予核發新的建照，卻未落實禁建的執法，使得社子島成為以蔬菜專業區、未登記工廠聚落與住家為主要土地利用方式的區域。由於「200年防洪標準」與都市計畫的「緊密關係」⁶，社子島防潮堤與社子堤防、渡頭堤防與社子島的交界，也就是「臺北地區防洪計畫」之高保護範圍與社子島之間的界線，成為劃分臺北都會與社子島，區隔「都市」與「非都市」的界線。究竟這條基礎建設意義上界線，如何透過各種論述、再現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實踐，而形塑社子島獨特的空間樣貌？這些論述、再現扮演什麼角色，而與社子島的日常生活之間，又存在什麼樣的拉扯與緊張關係？這將是接下來兩章將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⁶ 1987年行政院核定「社子島築堤保護案」後，社子島的防洪標準來到20年洪水重現期距，臺北市政府試圖以低密度土地使用為方向，透過區段徵收開發社子島，並於1993年公告《擬（修）訂社子島地區計畫案》，後因部分民意反對而未公告細部計畫。此後的社子島開發計畫的討論，皆以將社子島劃入200年洪水重現期距的高保護範圍為前提（臺北市政府，2016）。

第五章 臺北市（最美）的鄉下地方：文本與綠美化措施中的堤防地景



一、再現社子島

近年來，都市研究者注意到所謂「都市化」的過程影響的範圍遠大於既有認知的都市疆界，「都市」與「非都市」的界線更顯得模糊而難以捉摸，其分野非不證自明、自古始終如此。例如，Wachsmuth（2014）透過重新檢視都市理論與城市概念的演進，指出所謂「城市」的概念，其實是影響所及超過城市行政區界之都市化過程的再現(representation)，是一種「意識形態(ideology)」。

至於 Angelo（2016）則借鏡英國藝術評論家 Berger 之「觀看的方式 (ways of seeing)」的概念，指出「城市」的概念本身，是一種既不普世也非於歷史經驗之「觀看的方式」。這些「觀看的方式」，並非僅處於思想的、意識形態的範疇，而是能轉換為物質的效果。例如，Safransky（2014）對美國密西根州底特律（Detroit）都市的綠化政策與大眾媒體上之再現的討論，指出，綠化政策及其再現將底特律的「閒置土地」想像為等待開發的無人之地，以刺激私人投資這些空間，並使得原本居住、使用這些空間的弱勢群眾流離失所。

在第四章，本文透過回顧社子島不同時期的土地性質、土地使用方式與防洪基礎建設的設置情形，指出社子島的發展過程中，堤防一方面扮演了陸域化與領域化基礎建設的角色，同時也由於「臺北地區防洪計畫」造成的限制，維持 6 公尺的高度與 20 年洪水重現期距的保護強度。究竟社子島的空間特性如何透過再現與論述來形塑呢？阻隔了河水與陸地，同時也顯現社子島與臺北市之差異的堤防，如何被各種文本再現？2005 以來的堤階綠化認養、人工濕地營造等綠美化措施，如何給予社子島的堤岸地景新的意義？以上是本章探討的議題。



二、文本中的堤防地景

在作品中投入環保意識、時常走入大自然進行生態觀察的詩人劉克襄，為當代著名而重要的自然書寫作家（陳芳明，2011）。2011年6月12日，《中國時報》的藝文副刊「三少四壯集」專欄刊載一篇劉克襄書寫的文章，該文的標題為〈臺北的尾巴〉是這位自然文學作家造訪社子島後的遊記與地景書寫。在那篇文章中，劉克襄提到社子島是「一個生活在70年代的地方」，當地沒有公共建設與新的建築案，也沒有便利商店，缺少都市應該有的生活機能，而保留純樸友善的民風（劉克襄，2011/6/12）。除了書寫社子島相對接近臺灣鄉村樣貌、有別於都市的地景之外，劉克襄在文末將鏡頭轉向社子島的堤防，將堤防比擬為社子島與臺北之間的鴻溝。他寫道：

社子島真的不容易往前了……當地人不相信加高的堤防，阻擋得了大水……社子島難有扎實落地的基礎。儘管如今和台北緊緊連接，它依舊遠離台北，仍有一道鴻溝隔在中間，繼續是一座島（劉克襄，2011/6/12）

在劉克襄的筆下，雖然歷經兩次加高工程，但高度與保護強度仍相對較低的堤防，除了象徵的社子島之在地居民對於政府的不信任與相對剝奪感，社子島都市基礎建設之缺乏，還代表的社子島與臺北市之間，一條隔離兩者、無法填補的大溝渠。另外，楊力州導演於2014年上映的紀錄片《看不見的島》，則紀錄社子島一群剛從國中畢業的15歲少年的生活處境，而在片中強調社子島因為「臺北地區防洪計畫」而遭到禁建，使得社子島成為台北市被遺忘、邊緣化而「時空凍結近半世紀」（吳美慧，2014：104）的地方，社子島防潮堤則被楊力州導演形容隔絕社子島於臺北市的圍牆，而要「把這堵牆推倒」（吳美慧，2014：110）才能

讓這個「幫台北背 44 年十字架的小島」有美好的未來（吳美慧，2014：104）。相近的論述也出現於大眾媒體的報導中，例如，TVBS 新聞於 2015 年 1 月關於社子島開發案的新聞報導的旁白則說道「同樣的首都，同樣的繳稅，一道堤防，鎖住社子島的明天」（TVBS 新聞，2015/1/15）。於自然文學作家、新聞記者與紀錄片導演的再現之下，社子島被描寫為時常淹水、落後、破舊的都市「邊緣」，而臺北都會的堤防，在空間上象徵的社子島與臺北都會區的邊界，在時間上更代表鎖住社子島朝向「現代都市」之未來的障礙。

另外，2016 年由遠足文化出版之楊麗玲的《社子島！囚禁半世紀，被遺忘的孤島》一書，則延續上述之劉克襄、楊力州與新聞報導的書寫方式，強調社子島作為一個防洪標準僅達約 20 年洪水重現期距離的洪氾區，是一個被臺北遺忘的孤島。值得注意的是，該書的書寫與出版受到「喬大文化基金會」贊助，而該基金會是「喬大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組織⁷。該公司除了投入社子島不動產的投資、仲介不動產買賣之外，也透過參與社區組織活動、公共廟宇管理委員會等方式深入在地，被反對開發計畫的「社子島自救會」成員認為是社子島開發案的重要推手。楊麗玲的這本書也將社子島呈現為一個因為防洪計畫的緣故，而被臺北遺忘的地方，急需一番徹底的改變，在此時空背景之下，她對於社子島殘破一面的再現，似乎成為推動社子島開發案的動力。

儘管在外界的眼中，社子島與臺北之堤防的差異，時常象徵社子島與現代都市的差距，並與落後、破舊等負面形象有所連結，但此種觀看的方式並非再現社子島地景的唯一視角。部分來自在地的社子島地景觀點，則試圖將社子島的地景呈現為一個具備美好生態的理想中的鄉村。例如，溪沙尾的信仰中心坤天亭二樓

⁷ 喬大地產成立於 1989 年，是最早投入社子島、關渡平原等長期禁限建地區的不動產開發者（喬大地產，2016）。

正殿柱子上的一副對聯寫道「富安其富堤外廣土水環流/洲居中洲江上珍禽時群游」，即是以當地富洲里的里名兩字，當作上聯與下聯的首字，並將位於社子堤防、渡頭堤防堤外的社子島呈現為由淡水河、基隆河所擁抱，時常可見禽鳥棲息的自然樂土；富洲里的社區發展協會在 2011 年所作的《社子島之歌：臺北市最美的鄉下地方》歌曲，則透過對於有機菜園、社子島防潮堤外之紅樹林生態等地景，將社子島形容為「大自然的迪士尼」（臺北市士林區富洲社區發展協會，2011）。該首歌由社區發展協會前後兩任的理事長填詞，並由一位出生於社子島的音樂家作曲，如今常於元宵晚會、端午節划龍舟等活動由社區發展協會的合唱團演唱。



圖 5 溪沙尾的信仰中心坤天亭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透過對社子島堤防地景之再現的整理與討論，本文留意到文本中的堤岸地景存在兩種觀點：一方面，跟臺北都會相比之下較低的堤防，象徵著社子島有落後於臺北都會的負面形象，另一方面，相對較「自然」的地景，使得社子島也成為理想中的田園鄉村。前者的觀點一方面加深社子島的負面形象，且對於社子島的

開發計畫有積極的效果。部分在地社區的人士，則藉由強調社子島的田園地景與堤外之濕地生態的美好，以改變外界對社子島的負面印象。堤防地景的這兩種「觀看的方式」同時存在著，而自 2005 開始年的堤階綠化認養、基隆河側新舊堤防濕地重現鹹草埔產業記憶開始，一系列的綠美化活動也給予社子島的堤岸地景新的意義。

三、大自然的樂園：堤岸地景的綠美化

在媒體報導、作家書寫與紀錄片等文本的再現下，社子島防潮堤較低的高度與較弱的保護強度，以及將社子島與臺北都會分隔的社子、渡頭堤防的再現，時常與社子島時常淹水、落後、貧窮等負面形象連結再一起。儘管如此，社子島由於「臺北地區防洪計畫」之故而限建，而保存相對接近農村的風貌，因此有另外一種觀看的視角，透過對堤岸生態、農田景色地強調，將社子島想像為理想中的農村與生態的天堂。2005 年以來，由社區發展協會、臺北市政府水利處、錫瑠綠化基金會等組織或團體合作之下，堤階綠化認養、人工濕地營造等以社子島防潮堤為基礎的綠化、美化措施，讓社子島的堤防具有除了防洪之外有了新的功能，社子島堤岸地景的意義開始有新的轉變。這些措施究竟如何透過綠美化堤防與堤岸空間，重新想像、再現這個位於臺北都會外圍的社子島，是本節要討論的主題。

（一）堤防地景作為社區基礎建設：堤階綠化認養與藝術介入社區



社子島早年的社群活動多以聚落為單位，各個聚落之間的往來並不多，1990年代，幾位富洲里的居民響應文建會提出的「社區總體營造」，成立社區發展協會，進行社子島的社區營造工作。從 2006 年開始，社區發展協會利用堤防空間進行綠美化活動，使得社子島的堤防地景，除了防洪基礎建設之外，也隨著堤階認養的計畫，具備社區基礎建設的功能。

2005 年，在瑠公農田水利會與錫瑠綠化基金會協助之下，社區發展協會赴宜蘭縣員山鄉，參訪枕山社區以農村風貌為重點的社區營造的成果。參訪結束之後，社區發展協會的成員與水利處、錫瑠綠化基金會討論，決定利用社子島防潮堤的堤階植槽為綠化的空間，成立「社子島堤階認養人聯誼會」來進行綠美化工作，由臺北市政府水利處提供經費，至於瑠公農田水利會成立的錫瑠綠化基金會，則提供綠化的技術指導以及相關的資材。社子島堤階認養人聯誼會自 2006 年開始在東山宮旁的堤階種植各種多彩、耐風的景觀植物（錫瑠綠化基金會，2007）。堤階綠化認養的範圍在往後幾年有所增加，包括 2007 年增加島頭公園、2008 年增加社子島六號抽水站區域、於 2009 年增加洲美快速道路橋下的區域，目前社子島堤階認養一共有 74 個單元，約有 170 位認養人參與。每年舉辦競賽，表揚堤階綠化認養人種植與維護的成果，該聯誼會每年也定期舉辦聯誼活動，帶領成員到其他社區參訪與交流。參與堤階綠化認養的林老師提到，住在延平北路八段，相當於溪沙尾聚落的她，原本不認識七段、九段的人，參與堤階綠化認養之後，則多了一些住在七段、九段的朋友。在 2011 年，社區發展協會也參與臺北市立美術館的「藝術介入社區」計畫，由幾位年齡約 80 歲的女性社區成員參與美術館的訓練課程，並以「社子島時光隧道」為主題，在臺北海洋科技大學旁的堤防用壓克力顏料畫上養鴨人家、划槳載牛到蘆洲耕地、李復發號、關渡分潮、三角渡船、稻田水車等這些耆老在 1960 年代以前兒時記憶中的濱水與田園地景（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協會，2016）。



圖 6 堤階綠化認養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7 社子島時光隧道壁畫
資料來源：報導人提供

隨著社區發展協會參與藝術介入社區計畫獲得「最佳社造獎」、「評審獎」的榮譽，這項以堤防為基礎的藝術創作，給社區發展協會帶來不少光彩。但在數年

後，水利處在沒有告知居民或社區發展協會的情況下，粉刷這些社區成員繪製的壁畫，以電腦繪圖的彩繪取而代之，令林老師非常憤慨，認為這樣水利處此舉「就像 1970 年把社子島化為禁建區的政令一樣，隨隨便便一個政令下來，什麼都沒有」（訪談林老師，2020/2/11）。



社子島的社群早年多以聚落為單位，即使在行政區劃屬於同一里，各個聚落之間的往來較有限。透過堤階綠化認養、藝術介入社區等計畫，社區發展協會以堤防當作社區的基礎建設進行各種綠美化計畫，對內成為聯繫各聚落之居民感情，加強社區凝聚力的平台，對外則成為試圖擺脫過去外界對於社子島時常淹水、較落後的形象，讓外地人看見社子島之美的地景。有趣的是，堤岸地景的綠美化過程中，並非完全由「在地」所主導，而是包括了水利處、錫瑠綠化基金會等單位或組織，在地景營造的發想過程，也曾向其他農村社區的經驗學習。除了堤階綠化認養、藝術介入社區計畫，基隆河側堤防新舊堤防之間的人工濕地復育，也進一步為社子島的堤防地景帶來新的功能與意義。

（二）人工濕地營造

2006 年經過社區組織、居民與水利處之間長達半年的時間討論，市政府水利處決定利用基隆河側新舊堤防之間的空間，將原有的菜園降挖為濕地，並種植鹹草，以重現浮洲聚落早期河濱的鹹草埔地景。但是，由於種植鹹草之後缺乏後續棲地維護的工程，因為蘆葦生長速度過快、泥沙淤積造成陸域化嚴重，鹹草地景的重現最終以失敗告終。值得注意的是，這處空間自 6 公尺高的堤防興建時已徵收為公有土地，但在堤防建成後，仍有附近的居民繼續在新舊堤防之間的空間耕種蔬菜，直到此次重現鹹草地景的計畫，才停止菜園的土地使用。同時兼具在地議員助理身分的社區工作者謝大姐指出，在推動堤外空間濕地營造的過程中，

確實有遭到一些在地居民反彈，但因為社子島防潮堤內少有公有土地，若要爭取公園或其他公共設施的興建，只能選擇防潮堤外的空間。



2007 年，富洲里的社區發展協會以「找回居民兒時河濱生活記憶」為構想，向內政部營建署申請城鄉風貌計畫，爭取在位於淡水河側的第六號抽水站附近，設置堤外灘地的觀景平台，並引進士林扶輪社的資源，同時請荒野保護協會的師資前來製作生態浮島。謝大姐說道，他們當初推動基隆河側鹹草復育、爭取六號抽水站的觀景平台時，是想要回復當地 1950 年代以前出生的居民兒時與水共同生活的記憶，根本「不曉得什麼叫做濕地」（訪談謝大姐，2020/7/9），直到某日一位剛赴香港米埔濕地參觀、有意在臺北河濱營造濕地生態的工務局官員，在民意代表的陪同下，造訪六號抽水站的觀景平台時，看見一隻埃及聖鸚停留在浮島上，而認定這就是所謂「濕地」，並決定以社子島的河濱為濕地生態營造的據點。此後，社區發展協會也邀請臺北鳥會、荒野保護協會、士林社區大學、環境資訊協會等組織或團體的師資，為社區協會的成員講授濕地生態、自然觀察、生態導覽解說等課程，讓社區成員學習社子島河濱濕地的環境與生態，並培養成員成為解說員。

社子島的人工濕地營造，則從 2009 年開始展開。該年水利處先在第六號抽水站附近挖了 0.6 公頃的灘地試驗，並在 2013 年浚挖面積為 1.6 公頃的社六濕地。從 2014 年開始，社六濕地也是荒野保護協會復育鹵蕨的基地⁸。為了讓鹵蕨重新回到淡水河流域，荒野保護協會的一位老師在 2014 年開始與水利處合作，在社六濕地種植鹵蕨，到了 2020 年底為止，已有將近 50 株鹵蕨在社六濕地生長。

⁸ 鹵蕨是廣泛出現在熱帶地區河口環境的挺水性蕨類，最高可達 2 公尺高，淡水河口在 1850-1880 年代曾有採集的紀錄，但目前在台灣僅剩下屏東佳樂水濕地、花蓮富里羅山泥火山與台東關山雷光泥火山等地有野生族群（陳怡婷，2015）。



圖 8 生長在社六濕地的鹵蕨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隨著社六濕地營造的成功，水利處又將眼光轉向基隆河側新舊堤坊之間的空間上，於 2013 年底再次施作人工濕地工程，並委託一位專長生態工程的建築師與一間景觀工程顧問公司設計與規劃社子島人工濕地。基隆河側新舊堤坊人工溼地的設計者指出，由於社子島基隆河側新舊堤防濕地的範圍相對社六濕地範圍較大，占地 8.4 公頃，且有 4 米高的舊堤防保護，使得棲地情形較為穩定，加上本身處於鹹水與淡水交界的感潮地帶，其生物多樣性較高，是營造濕地生態的佳址。

該設計團隊將新舊堤防的空間，依據生態特性不同，分為感潮濕地生態區、草澤濕地生態區兩大區塊，這兩區塊並依據人為干擾的程度，細分為「生態核心區」、「生態改善及微棲地營造區」、「生態景觀區」等三種類別，其中生態核心區為非干擾區，生態改善及為棲地營造區則是進行生態工程的區塊，生態景觀區則是民眾觀景或進行環境教育的空間。除此之外，設計者也劃設淡水域濕地生態區

一半」而已，另外一半的工作，要留到打造不同的棲地後，「等待生物自己進來」
(訪談陳建築師，2020/2/19)。




在針對社子島濕地的營造與維護訪談陳建築師時，建築師也十分強調棲地維護工程的重要性。因為濕地本身是處於水與土之間之中介狀態的空間，且基隆河含沙、含泥量高，潮進潮退都會帶來淤積，加上生長強勢的蘆葦、水筆仔，若沒有定期的浚挖工程以及蘆葦、水筆仔的清除作業，人工濕地很快就會陸域化，並造成像 2006 年那次營造，最後生物多樣性下降的結果。隨著生態監測的結果，若出現與預期不同的情形，人工濕地也有浚挖工程的需要。例如，2017 年 8 月社子島的人工濕地便實施降挖工程，重新配置濕地的灘地範圍，增加在滿潮時仍露出水面之灘地的面積，以讓滿潮時鳥類仍有歇腳的空間。此次降挖工程與後續的維護工作帶來如期的成果，成功吸引太平洋金斑鴿、磯鶻、田鶻、青足鶻、小環頸鴿等過境的候鳥前來社子島濕地棲息，同時也有黑面琵鷺、四斑細蟬等知名保育類物種的觀察紀錄（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2019）。



圖 10 社子島濕地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水利處除了透過生態工程營造、維護人工濕地外，也於 2016 年堤防上以貨櫃屋打造「社子島濕地解說小築」，當作生態解說與環境教育的場地。同時，臺北市政府水利處也委託民間的公司，成立「河濱濕地生態志工隊」，負責社子島濕地的生態解說、環境導覽以及棲地維護等工作。目前該志工隊有超過 60 位志工，其中以社子島外的臺北市、新北市居民佔多數，亦有幾位社子島的居民參與。社子島生態小築除了在週末定期開放之外，也不定期舉辦環境教育活動，內容包括鳥類與螃蟹生態觀察、水筆仔染布體驗、蘆葦手抄紙體驗等。部分的場次也會讓參加者體驗棲地維護工作，讓參與者穿著雨鞋，踏入濕地的範圍內，體驗外來種植物移除、水筆仔移除、蘆葦移除、撿拾垃圾等棲地維護工作。如今，隨著濕地生態營造的成功以及環境教育活動的推行，社子島濕地已成為社子島具有代表性的景點，社子島同時也成為臺灣北部的賞鳥勝地之一（張世杰，2020/6/3）。

四、小結

本章討論社子島的防潮堤作為「觀看的方式」之地景，其在紀錄片、書籍、作家書寫、新聞報導等各種文本的論述的再現，以及 2005 年以來各項綠美化措施帶給堤岸地景的變化，及其意義的轉變。對於社子島堤防與堤岸地景在各種文本的再現，本文注意到堤防地景的再現，包括兩道堤防之間的差距，連結到社子島的時常淹水、長期禁建，相對落後而貧窮的負面形象。此這種強化社子島負面形象的地景論述，在近年來似乎也與支持開發案的聲音結合，透過強調社子島的落後、待開發，來合理市政府的開發計畫，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支持開發案的力量。儘管如此，由於處於都市相對外圍，社子島相對臺北都會保存較多都市化前的鄉村風貌，也有一些觀看社子島地景的方式，透過強調社子島的田園風光、濕地生態，試圖改變社子島長期以來的負面形象。



2006 年以來，在當地政治與社區工作者、社區發展協會、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處、錫瑠綠化基金會、臺北市美術館等不同身分的個人、機關、團體或組織的合作之下，社子島的堤防開始展開堤階綠化認養、藝術介入社區等綠美化計畫。這些計畫一方面讓堤防成為社區成員向外展示社子島之美的空間，另一方面，也使得堤防空間成為社子島各聚落居民有機會認識、合作與交流的平台，讓堤防也成為凝聚社區情感的基礎建設。

另外，在地政治工作者與社區發展協會也以「重現浮洲鹹草產業記憶」、「找回兒時水岸記憶」為發想，分別在基隆河側新舊堤防之間的空間以及社子島的六號抽水站的空間，浚挖灘地並種植鹹草、設置進入灘地的觀景平台，而此出於懷舊的地景營造，在臺北市政府長官視察之後，轉以「濕地復育」進行營造。水利處投入資源營造社六濕地、基隆河側新舊堤坊間的社子島濕地，透過生態工程的建設與維護，成功吸引許多鸕鶿科、鷺科與鸚科的水鳥，並透過濕地生態解說小築以及濕地生態志工隊的管理，讓社子島濕地成為環境教育的場域。堤防建設阻隔了水與陸地，而人工濕地的營造，則試圖將「水」與「陸地」重新結合，這些建設不僅連結了多種涉禽、水生昆蟲等動物，也讓臺北鳥會、荒野保護協會等關心生態的團體以及其他自然生態愛好者前來社子島，使得社子島濕地成為臺灣北部的賞鳥勝地。

本文認為堤防與堤岸空間在近年來成為社子島的關鍵地景，至少有以下三個原因。首先，由於社子島由於尚未徹底實施都市計畫，堤內較缺少公園綠地等公共設施，且目前堤防內的土地多為私人所有，難以徵收而興建上述公共設施，使得產權屬於政府的堤外空間成為進行這些公共建設的選擇。另外，社子島相對地勢較低，從堤內的防汛道路一望，6 公尺高的堤防顯得雄偉，而堤內的防汛道路也是社子島的時常經過之處，因此在堤防，或於防洪牆的堤壁彩繪，很容易獲得

這些來往社子島之人們的關注。最後，堤岸空間乘載著堤防興建以前，居民們與水共生的生活記憶，此記憶成為相對於其他區域的特色。這些以重現記憶之名進行的同時堤岸空間的營造，也與近年獲得重視之濕地生態有所相關，而成為在地社區與政府官員皆有興趣營造的焦點。

一方面而言，社子島堤防與堤岸的綠美化措施，將社子島打造為社子島的生態天堂，而試圖翻轉社子島的負面形象，改變長期禁建與時常淹水所獲得的污名，卻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部分在地行為者的參與，而加強社子島與臺北都會的對比。用 Mitchell (1996) 與 Kirsch (2015) 的概念來審視，經過綠美化之後的堤防地景，是不同時期的堤岸地景的物質與論述堆疊而成的結果，而以生態天堂般地人工濕地，於一定程度上掩蓋了社子島在發展過程中的不正義，是一個去脈絡化的地景。最終，不論將社子島視為殘破、落後的洪氾區，或者充滿自然生態的天堂，社子島始終是相對於臺北都會的他者。

然而，有別於 Cosgrove and Daniels (1988)、Mitchell (1996) 等新文化地理學 (new cultural geography) 理論者較強調塑造地景的結構性力量，透過檢視社子島濕地營造的過程，本文注意到，這個外在的結構性力量塑造地景的過程中，在地居民、在地政治與社區工作者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其復育概念之開始，甚至是基層社區工作者與在地居民的發想。因此，所謂外在的、結構性的力量不容忽視，但從社子島人工濕地復育的案例看來，其之所以達成，有賴於政治與社區工作者穿梭在市政府與地方之間的斡旋。這些人一方面掌握關於來自市政府的資源的資訊，另一方面又能走入在地與社區民眾協商，而扮演如橋樑與平台的角色，在地景塑造的過程中非常關鍵。

Wylie (2007) 指出是地景是「親暱與疏遠、感官沉浸與自外觀看」之間的張力。本章已討論社子島地景中，疏遠、自外觀看的一面，至於其另外一面，則有待下一章的分析。究竟將社子島堤岸空間想像、建設成人工濕地的過程中，與社子島堤岸土地的使用上有什麼樣的緊張關係？社子島的傳統民俗文化中，如何體現其獨特的人與水之間的關係？面臨開發案之迫遷壓力的在地居民，是如何看待社子島的防洪基礎建設？在下一章，本文將把討論的焦點轉移到這些作為「觀看的方式」之地景的另一面，來探討與社子島的防洪建設、人水關係相關的日常生活地景。

第六章 「洪氾區」的另一面：防洪建設、人水關係與社子島的日常生活地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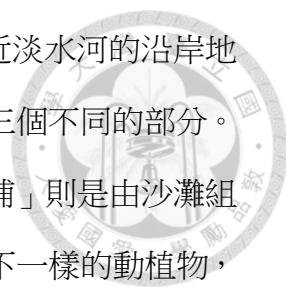


本章的分析焦點，轉移到社子島居民的「日常生活地景」。所謂日常生活地景，指的是人們透過日常生活中，透過規律的節奏，而逐漸形塑之動態的地景；而在此意義之下，「人」與「地景」的關係，本身並非分離在外的觀察者，而是參與並棲居其中，與地景難以分離（Jackson 1997；Cresswell 2003；Wylie 2006）。接下來，本文將分別並從社子島居民的河濱生活、各聚落的民俗信仰活動，以及防洪基礎建設廣泛影響之下的日常生活等三個層面，探討社子島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其人水關係以及堤防建設的意義，並進一步探討「日常生活」與作為「觀看的方式」之地景之間的張力。

一、沒有人的生態天堂？社子島居民的河濱日常

2020 年 6 月初，一則關於社子島濕地的新聞報導，成為大家熱議的焦點。臺北市府水利處發現，有民眾在社子島濕地架蜈蚣網以捕捉螃蟹，水利處便立即派員移除蟹籠，並主張這樣的行為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⁹，最高可依法開罰新臺幣 6000 元（張世杰，2020/6/3）。今日的社子島人工濕地，是一處以涉禽為主的生態營造據點，而在過去，社子島的居民們過著與水非常緊密的生活，河濱的灘地，可說是家戶空間的延伸；直到今日，仍有一些社子島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與堤外空間有很深的連結。社子島居民們在過去與今日的河濱生活，是本節討論的焦點。

⁹ 《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 13 條規定，公園內不得網魚、釣魚、銼魚，或其他傷害動植物之行為。第 17 條規定，若違反上述事項，可處行為人新臺幣 12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罰鍰。



世居溪沙尾、1958 年出生的李演文指出，過去溪沙尾鄰近淡水河的沿岸地區，從陸地往水域的方向，可分為「內港」、「沙埔」與「口港」三個不同的部分。所謂「內港」指的是較靠近陸地而長年有水的窪地，至於「沙埔」則是由沙灘組成的高灘地，「口港」則是高灘地之外的水域。這三個部分，有不一樣的動植物，居民們也有不同的利用。「內港」長滿了挺水植物鹹草，鹹草可以做成繩子、草蓆、草帽。此外，內港也有一些毛蟹，但人們通常不會食用毛蟹，而是拿去餵豬。「沙埔」則是沙地，是大家種植地瓜、南瓜、花生等可以在沙地生長之作物的空間。而「口港」則有蛤蜊、大蝦、鰻魚、花身魚、午仔魚等水產，人們常以蚯蚓為餌釣魚、抓蛤蜊與蝦子，而口港也是人們會去洗滌衣物的場所。至於基隆河岸，除了有許多鹹草之外，其地形較接近泥灘地，曾有居民們稱作「浮崙」的貝類，其形狀如放大版的蛤蜊，殼可長達 8 公分左右，吃起來與蛤蜊類似。另外，早期基隆河裡也有一些沙蝦，王樹群回憶道，他以前會伸手到泥灘裡四處探索，抓到長條形狀的東西，如果摸起來是光滑的，便是可以吃的蝦子；若摸起來很粗糙，就只是樹枝。除此之外，能當作魚餌或鴨子及鰻魚飼料的紅蟲，在 1950 年代曾經大量出現在淡水河與基隆河邊，也是當時在社子島河濱生活的人們時常捕抓的水產。

在堤防築起之後，過去「內港」、「沙埔」與「口港」的地景已經消逝，而原本以沙岸為主的河濱，也在 1970、80 年代，因為上游興建水庫、淡水河抽沙等因素轉為泥灘地，河水中的鰻魚、蛤蠣、大蜆、毛蟹、沙蝦等動物，也因為河水汙染而大幅減少，甚至消失。儘管如此，在一些社子島居民的日常生活裡，堤外的河濱與水域，仍然是他們前往捕撈水產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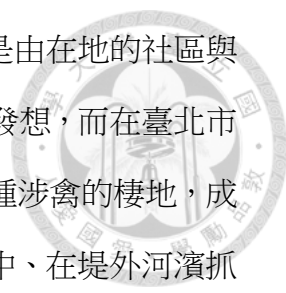
除了在幾處河濱時常可見到釣客釣魚、以蜈蚣網抓螃蟹之外，溪洲底淡水河側堤防外，靠近靈威公廟附近的灘地，也有用 1970、80 年代之抽砂船改造而成

的船屋。船屋平時停泊在高灘地上，當颱風帶來大雨使得河水淹沒高灘地時，船屋就會隨著河水浮起。而在船屋生活的人們，除了會在高灘地抓螃蟹之外，也會開舢舨到淡水河中央放置蜈蚣網，隔天再將蜈蚣網拉上來，有時一次就可抓到十幾隻紅蟳與毛蟹。除了紅蟳、毛蟹之外，這些捕蟹人有時也會捕撈白鰻、地龍等魚獲，而在沒有抓螃蟹的時候，停泊在高灘地的船屋也是他們泡茶、聊天的聚會空間。在此，這個坐落於「堤外」的船屋，展現了社子島昔日親水生活的蹤影。另外，所謂的「口港」地形，曾經因為 2006 年以「重現鹹草埔」為意象的人工濕地營造工程，缺乏後續棲地維護，造成部分區域陸域化，而在那幾年之中，出現經常有水的窪地，有如魚塢一樣，成為釣魚人士喜歡造訪的地點。雖然 2013 年人工濕地大幅施工，使得今天已經沒辦法在社子島的河濱看到所謂「內港」、「沙埔」與「口港」的地景，但位於基隆河側新舊堤防之間的人工濕地，仍是部分在地人士抓魚與螃蟹的空間。



圖 11 位於溪洲底淡水河濱的船屋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在第五章，本文提到近幾年社子島的人工濕地營造，最初是由在地的社區與政治工作者，以重現鹹草埔地景與居民兒時水岸生活記憶概念發想，而在臺北市政府水利處官員的治理下，歷經幾次降挖工程，成功將該地多種涉禽的棲地，成為北臺灣重要的賞鳥據點。儘管如此，原本生活在堤岸地景之中、在堤外河濱抓魚蝦、捕螃蟹的居民，則被排除在人工濕地的地景之外。對此，住在浮洲的王開元感嘆到，現在做成人工濕地的地方「本來就有生態，為何政府要把原本的生態破壞掉，再創造一個新的生態？」（訪談王開元，2019/6/9）。有趣的是，也有出身社子島在地的「人工濕地」志工，說她「當志工不是為了水利處」，而是把人工濕地的生態小築「當作一個廟埕，跟每一個造訪這裡的遊客，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訪談李玉釵，2019/6/30）。這位出身在地的志工，在擔任志工的過程中，沒有完全將水利處要求的環境教育內容灌輸給到訪的遊客，而是將生態小築當作傳統鄉村人際交流之重要據點的「廟埕」空間，與他們交流各自的生命經驗，使得原本以發揮了不同於原本定位的功能，並從來自外在的結構性力量的地景營造中創造了一絲縫隙。而，除了到社子島濕地賞鳥，今日也有許多人到社子島防潮堤防上面的自行車道騎自行車、慢跑或健行，但這些形式的「親水」活動，卻與社子島的居民們早期以河濱為住家延伸空間的親水生活方式不可同日而語。

二、傳統民俗與人水關係

除了在日常的生活中與堤岸地景緊密連結之外，社子島的居民們與水獨特而親近的關係，也體現在傳統民俗信仰與活動之中，其中以端午節的划龍舟祭江儀式，最具有代表性。端午節的划龍舟祭江儀式，是社子島浮洲、浮汕兩聚落行之已久的傳統，其中，浮洲的划龍舟祭江都在農曆 5 月 5 日，而浮汕的划龍舟祭江，則於每年農曆 5 月 7 日舉行。

划龍舟祭江儀式是以水仙尊王為核心的民俗活動，其宗旨在於滌淨環繞社子島的淡水河、基隆河水域，並藉由划龍舟的友誼賽，維繫聚落人們的感情。浮洲的划龍舟祭江以「景安宮」為中心，浮汕則以「福德宮」為中心舉辦。女性至今仍不被允許划龍舟，若家中有親人過世而尚未滿一年者，也不被歡迎上船。兩地的划龍舟祭江儀式，皆可分為「獻江」、「划龍舟競賽」以及「謝江」三個階段。首先的「獻江」儀式從下午二時左右開始，兩艘龍舟巡迴基隆河與淡水河水域，並在過程中鳴放鞭炮、灑下金紙與銀紙，以祭祀水仙尊王及其他水中的眾神靈。



圖 12 浮洲划龍舟祭江儀式的水仙尊王香案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在獻江完成後，就開始兩艘船競渡友誼賽。究竟划龍舟祭江的兩艘船，是如何組隊呢？根據幾位報導人的說法，傳統上，在浮洲聚落，是頂浮洲一艘船、下浮洲一艘船互相較勁，至於浮汕的龍舟競渡，李姓一艘船、其他姓氏一艘船，或者浮汕一艘船、溪沙尾一艘船，亦有中年人一艘船、年輕人一艘船等不同的做法。浮洲與浮汕的龍舟競渡友誼賽，分別以基隆河與淡水河長約 500 公尺的水域為賽道，比賽時，兩艘船從相對上游的位置往河口的方向順水划行，船上的男丁們，必須跟著鼓手擊鼓的節奏，出力喊聲、划槳，比賽哪一艘船先奪得終點上的鏢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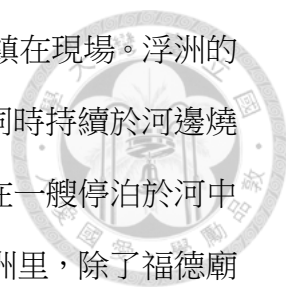
划龍舟的動作看似單純，但比賽時除了要以正確的方式充分發揮手臂與腰部的力量之外，還要懂得分配力氣在不同階段，且考驗著整艘船的默契。是否是在地出身，從船槳的握法、划水的姿式、是否能與前後的人配合，馬上可以一目了然，而我在參與兩地龍舟競渡友誼賽時，皆一再被其他人糾正握槳與划槳的動作，這外地人的身分，頓時畢露無遺。

有趣的是，浮洲的居民指出，由於該地基隆河在靠近八仙的一側有個漩渦會造成阻力，通常靠近社子島那一側的龍舟都會獲勝。而由於每比賽完一趟，兩艘船便會交換水道，使得這兩艘船上的人們，都有機會享受勝利的喜悅。最後的謝江活動，旨在感謝水仙尊王保佑活動順利進行，其過程與獻江類似，皆是巡迴聚落周遭的水域，並灑下金紙、銀紙。但與獻江不同，為了避免「打擾河中的眾生」（參與觀察記錄，2020/6/27），同時表達莊嚴、肅穆的氛圍，社子島兩聚落的划龍舟祭將儀式的謝江階段並不放鞭炮，鼓手也不擊鼓，在謝江時擊鼓，則被在地的長輩視為一種禁忌。



圖 13 浮汕划龍舟祭江儀式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不論是浮洲或是浮汕的划龍舟祭江活動中，水仙尊王也坐鎮在現場。浮洲的居民們在岸上設置水仙尊王的香案，並在案上擺設各種供品，同時持續於河邊燒金紙；至於浮汕的划龍舟祭江活動中，水仙尊王的金身則坐鎮在一艘停泊於河中的舢舨上。另外，由於行政區劃上溪沙尾也和浮汕一樣屬於富洲里，除了福德廟的水仙尊王，來自溪沙尾坤天亭的中壇元帥、黑虎將軍也會被迎上舢舨，與水仙尊王共襄盛舉。在浮洲聚落進行划龍舟祭江時，一位地方頭人指出，社子島兩聚落龍舟競渡最重要的目的，便是「尊敬淡水河、基隆河，尊敬河神，尊敬不幸在河水往生的先人」（參與觀察記錄，2020/6/25）。在此，社子島的浮洲、浮汕兩聚落的居民們，透過划龍舟、投紙錢於河水中的儀式，表達對淡水河、基隆河兩條河流的敬重，並祈求水仙尊王保佑河川平靜安寧，同時也緬懷、告慰眾多歷年來不論因為洪水，或船難等意外而在水中不幸過世的人們。這樣的儀式，也凸顯了社子島的居民與河水親密的關係。

在浮洲與浮汕兩聚落，端午節除了有划龍舟祭江的儀式之外，也是各個家族的人們吃「辦桌」團圓的日子，已經離開社子島、到其他地方成家立業的家族成員，也會在此時回到聚落，在下午參與划龍舟祭江後，於晚上共吃團圓飯，可說跟農曆新年一樣熱鬧。出身浮洲的王忠興，由於經營事業有成，曾在 1980 年代花了近七十萬元捐出兩艘使用至今的木製龍舟，是浮洲能持續舉辦划龍舟祭江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說，會這樣子出錢、出力維持傳統，是希望可以繼續實踐上一輩教給他們的傳統文化。他也希望在他之後，還能代代相傳。另外，由於划龍舟競渡需要大量人力物資，這兩聚落都以每年選出「爐主」與「頭家」輪流負責辦理，而經費來源除了來自地方人士的捐獻之外，還有景安宮、福德宮向聚落各戶收取的「丁錢」。此外，浮汕的福德廟也與蘆洲的保和宮共同舉辦以五年為一個週期的祭祀儀式，第一年為迎接神明的「許平安」，中間則有三年的「太平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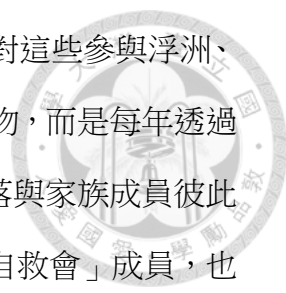
第五年則是感謝神明庇佑的「謝平安」¹⁰。雖然蘆洲與社子島在行政區劃早已分屬兩市，昔日往返的水路交通也已不復見，但早期「蘆社一家親」的關係，仍可以在這項民俗活動中看見。



在溪洲底最著名的民俗信仰活動，則是每年元宵節的「夜弄土地公」。溪洲底之下有「塹寮」、「中窟」、「戲台口」、「港墘仔」、「下竹圍」等聚落，這幾個聚落的壯丁，會戴斗笠、打赤膊，僅穿著以不同顏色代各自聚落的內褲，扛著各自土地公的神轎，從元宵節當天上午開始繞行臺北市、新北市為社子島外的親友或工廠、店家祈福，並在晚上回到社子島，開始繞行溪洲底的各個巷弄之間，而各家戶與店家也會準備鞭炮，在土地公神轎經過時點燃，炸向土地公神轎以及這些扛神轎的壯丁們。在晚間，居民們也會提燈籠造訪各個店家，換取店家準備的小禮物。這「夜弄土地公」活動的源由眾說紛紜，其中一種說法指出，之所以用鞭炮炸土地公，是想要以鞭炮的能量「喚醒」土地公的靈力，祈求土地公保全社子島的土地，免於遭洪水沖走而流失（臺北市立文獻館，2017）。除此之外，溪沙尾的坤天亭也曾有「水上進香團」前來進香，該進香團經過陸路來到八里，再以渡輪、水上摩托車度過淡水河，從島頭公園上岸，經過延平北路九段、八段，來到坤天亭進香（臺北市立文獻館，2017）。因此，社子島的浮洲、浮汕、溪洲底、溪沙尾等四個聚落的民俗信仰活動中，皆可以看到與「水」有關的元素。

值得注意的是，溪洲底的「夜弄土地公」以及浮汕、浮洲的划龍舟祭江活動，在最近幾年日益獲得外地人們的關注，而福安里的社區發展協會也以「文化祭」的形式，讓原本僅有在地人參與的成員，成為社子島內、外的人們皆可共襄盛舉的活動。究竟這樣的轉變，長期而言會帶來什麼影響，其中又有什麼樣的文化與

¹⁰ 報導人指出，過去「太平年」僅有一年，為「許平安-太平年-謝平安」三年一輪的循環，最近幾年則將太平年延長為三年，而改為五年一輪。



權力關係的轉變，是未來可以關注的方向。但這其中不變的是，對這些參與浮洲、浮汕划龍舟祭江的人們而言，河川並不是一種與人無關的自然物，而是每年透過儀式尊敬、敬畏、祈福的對象，其中充滿了生靈，且連結著聚落與家族成員彼此的關係與感情。另外，反對「生態社子島」開發案的「社子島自救會」成員，也曾在 2019 年 6 月，分別以陸上划龍舟、抬土地公神轎衝向臺北市政府的方式，表達對開發案的不滿。此時，象徵著社子島人們與水關係的龍舟，以及代表聚落力量與守護土地的土地公信仰，也轉化成為社子島的居民們抵抗臺北市政府的重要符號。

三、「洪氾區」的日常生活

（一）禁建之下的築造活動

在第四章，本文提到因「臺北地區防洪計畫」而成為限制發展區的社子島，除了先後興起了蔬菜專業區與由未登記工廠為主的產業聚落，也出現多元的住家與居住的形式，而這些多元住家與居住形式之下的日常生活，是本節討論的焦點。這些社子島居民們的日常生活，雖然與堤防建設或堤岸地景本身看似沒有直接關連，但與社子島成為洪氾區的背景有緊密的關係。

在 1970 年代之前，受到早期土地價值較低，加上早期家族成員習慣以口頭約定分配不動產物權，有些社子島的地主，允許或默許其他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搭建房屋居住，而這些在其他人的土地蓋房子的居民，居住到今日，便成為人們所謂的「有屋無地」或由於房子登記者另有其人而成為「無屋無地」者。居住在浮洲的地瓜葉農王開元，就是有一位「無屋無地」者。他說，他的父親在得到地主

允許之下，於 1975 年自己蓋起了二層樓的透天厝，而與其他家庭成員分住一、二樓至今，他們雖然知道土地的所有權人，彼此卻沒有什麼聯絡，但目前也沒有衝突與糾紛。



除了「有屋無地」或「無屋無地」之外，隨著家族繁衍，人們結婚、生育使得家族成員越來越多，卻沒有辦法合法興建新的房子讓新的一代居住，部分居民只好在原本只有一樓的房子之上，用較輕的建材加蓋二樓、三樓，讓數個小家庭同住在一間屋子，而彼此共享同一門牌，而造就所謂「一屋多戶」的情形。曾經在這種「一屋多戶」的住家生活的許又君提到，在這種多人共享一屋的住家生活，與一般住家相比，最大的不同與挑戰在於「用電」。多人共享一個門牌號碼，僅能申請一戶的用電，若幾戶人家同時煮飯、洗澡，容易發生跳電的狀況。因此，她必須跟其他住家成員協調生活節奏，錯開煮飯、洗澡或其他可能有高耗電需求之活動的時間，以免有電力超過乘載而跳電的情形發生。原本住在都會區的她，嫁來社子島之後，也花了一段時間才適應這種生活。

另外，由於房子逐漸老舊、危險，也有不少居民們在不拆除既有房屋主體結構的前提之下，重新整修、裝潢房屋，讓原本已老舊、危險的房子，成為安全、舒適而堪居住的住家。例如，1960 年代出生、世居浮汕聚落的陳崇光，原本與另外九個家庭住在一棟四層樓的老公寓，幾年前因為想要跟妻兒有更大的居住空間，就在原本住家附近找了一棟禁建令以前就蓋起來的房屋承租，並且花了 110 多萬元，以輕鋼架為主要建材，重新裝修房屋，將房屋搭建成二層樓的住家。不論是所謂「一屋多戶」或是裝修舊屋，這些多元而有機的住家情形，都是在禁建令之下，社子島的居民們為了維持生活的策略。像陳崇光一家這樣在社子島並非少數，今日若走路社子島四個聚落的巷弄，常可以看到新建物與舊房子彼此鑲嵌的地景。



圖 14 搭著鐵皮的磚頭厝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15 經翻修後成為二樓高的住家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因為成為洪氾區的緣故，社子島出現了多元的住家形式，居民們也以重新整修、裝潢老舊房屋等方式，繼續生活在 1970 年之前興建的房屋之中。此外，社

子島的許多居民也透過將建築基地的土地填高¹¹、在自家的門口加裝擋水門等手段，並在颱風過境的時候，將家中較重要的財物放置在高處等方式，來降低洪水期間家戶的損失。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沒有相當於臺北地區防洪標準之下的堤防，但對於一些居民而言，在當前防洪基礎建地的保護之下，他們已經可以善用自己的方式，來因應洪水的威脅，並繼續在社子島居住、生活。



圖 16 基地填土的住宅

資料來源: 作者拍攝

¹¹ 有報導人指出，大約 1990 年代開始，臺北市、新北市因建築工程而出現大量的建築廢土傾倒需求，而當時執法較難深入，且地勢低窪的社子島，成為部分廢土的接受地點。在幾年之間，臺北、新北兩市的建築廢土，以「卡車」為單位，透過社子島內或島外之中間人介紹，傾倒在需要填土的土地上，並當作建築基地或農地使用，以減少因洪水而受損的機率。除此之外，社子島也出現未經地主許可隨意遭傾倒廢土的情形。社子島的廢土、填土相關討論，亦可參見陳鴻筠（2019：51）。



圖 17 居民自製的擋水閘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最後，這些社子島居民們的住宅顯現了「臨時」的性質，而這與討論已久的開發案有關。例如，陳崇光就指出，他自己花 110 多萬元修繕、裝潢的房屋，如果能夠住個十年、十五年，就覺得「回本」，在每任臺北市市長都提出社子島的開發計畫的狀態下，不知道究竟房屋在什麼時候會被拆掉。此日常生活地景，反映了 Jackson 所謂「常民地景」的兩個層面，一方面，它是居民們由下而上的日常生活中所活現的棲居空間，另一方面，這個日常地景也處於不安穩(*insecurity*)、不確定(*uncertainty*)與臨時性(*temporality*)的特質，而一直處於動態的過程之中 (Jackson 1997 ; Wylie 2007 ; Brox 2019)。




(二) 社子島作為家園

除了原本就居住在社子島的居民，土地價格相對便宜的社子島，也是許多從中南部上臺北打拼之城鄉移民的家園。例如，今年 65 歲的鄭逢春，老家在彰化，他在 20 多歲時隻身前來臺北發展，便選擇在社子島落腳，也曾經在位於社子島的金屬模具工廠上班。身為殘障人士的鄭逢春，從工廠退休之後，就利用分大左右的農地，種植高麗菜、絲瓜、冬瓜、白菜、玉米等作物維持生計，而他也得以用每月僅 4000 元的租金，承租 20 坪大的公寓，在退休之後繼續留在臺北生活。

從都會中心嫁到社子島的許又君說，與都會中心相比，社子島晚上沒有什麼光害，還因為社子島鄰近河口，加上全區都以平房、農地為主，在此生活十分涼爽，鮮少需要使用冷氣。此外，她也提到搬到社子島後，對四季節氣的轉換非常敏銳：夏天時常聽得到蟬鳴，秋天時處處聞得到桂花香，冬天則可以明顯感受潮濕的空氣。另外，由於社子島上務農人口較多，有不少居民雖然不是職業農人，也常在約半分大的空地種植蔬菜等農作，因此居民與居民之間，也時常互贈自己種植的蔬菜水果，或以農作物當作協助勞動的報酬。對許又君來說，社子島的生活就像在中南的鄉村一樣「快活」，且若要市中心工作、購物或辦事，只需要 15 到 20 分鐘就可到市中心，因此能同時享有「鄉村的閒情」與「都市的便利」（訪談許又君，2020/10/5）。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幾年，社子島成為臺北市新移民比例較高的區域（陳竑達，2011）。在富安國小擔任志工的許又君說，富安國小志工隊中，有超過一半的「志工媽媽」是新移民，志工隊甚至曾因為非本國籍人士不被允許擔任有民防



團體性質的義交而困擾¹²。許又君也觀察到，儘管這些志工媽媽們；除了在廟宇活動或平常的休閒活動，也常看到新移民與在地者合作、互動的情景。在一定程度上，社子島不同族群背景的人們和樂共融的地方。此外，社子島也是中老年人比例相對較高的區域，而由於禁建的原因，社子島的老人們的鄰里關係，沒有被高樓大廈的住宅阻擋，熟識的鄰居與鄰居之間時常可互相照應，人們幾乎每天都到樹下或涼亭泡茶聊天，並且一起每月兩次到坤天亭、威靈廟或九段福德宮吃「犒軍菜」，並在午後到堤防與堤外綠地運動健行，若有需要，也可相約坐公車到市區的醫院解決病痛。如此，在一位居民的口中，社子島同時也是「最自然的長照中心」（訪談王樹群，2020/7/8）。

在本節，本文首先揭露部分社子島的人們在禁建令之下發展的多元住家形式，接著從一位從市區嫁到社子島之居民的觀察與經驗，談論在社子島生活的一些特色，並且進一步從新移民、年長者兩方面，試圖勾勒出人們在這個「洪氾區」之下的日常生活地景。對一些社子島居民們來說，6公尺高的社子島防潮堤，已足以抵擋威脅生命安全的洪水，讓他們保有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家園。例如，在回答關於對社子島防潮堤改建的立場時，王樹群說道：

6米高的堤防過了20幾年，雖然偶爾會積水，但很快就退去，我們的生活也過得好好的。現在市政府拿防洪計畫綁架開發案，加高的堤防不是要保護社子島的居民，而是要搶走社子島的土地，把我們居民趕離社子島。（訪談王樹群，2020/7/8）

¹² 根據〈臺北市國民小學交通導護志工隊設置要點〉第三條的規定，各學校的交通導護志工隊的小隊長、副小隊長需具備義交身分。

對王樹群等部分社子島的居民而言，現有的堤防高度已經足夠，至於在「生態社子島」開發案中，臺北市政府計畫興建的 9.65 公尺高的堤防，並不是要保護目前生活在社子島的居民們，而是以防洪之名義，取得社子島的土地，趕走這些在這塊土地生活的居民。



四、小結

透過對社子島過去與今日河濱生活的考察，可以看到河濱地景社子島的日常生活中，是相當於家戶之延伸的空間，而這些生活在河濱的人們，也是地景之中的一部分。浮洲與浮汕的划龍舟祭江等民俗信仰活動，則展現了社子島人們不同於水利工程或都市規劃者眼中的人與河川的關係。最後，從社子島居民們在禁建令之下建造多元形式的住家的過程，以及其他日常生活面貌，可以看到這個「洪氾區」，對一些居民而言，是他們安居樂業其中的家園。其中，「臺北地區防洪計畫」雖然讓社子島的發展走向與鄰近區域不同的路線，持續處於都市相對「邊緣」的狀態，卻也讓這些部分具有弱勢身分的人們，有個得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本章藉由對這些社子島日常生活背景的探索，觀察到有別於堤防在文本的論述與再現及綠美化中呈現的面貌。社子島人們的河濱生活、與水相關的民俗信仰活動，展現社子島居民日常生活中「親水」的一面，至於部分居民在不同形式之住家的生活，則展現社子島的日常生活中，其多元、有機而包容的面貌。這些居民生活在其中的常民地景，用 Wylie (2007) 的架構來說，是屬於親暱的、沉浸而棲居其中的地景。

另外，本文在此並非主張社子島居民的觀點中不存在「都市/鄉村」等二元的概念。在面對研究者的訪談時，幾位在地的居民，便透過強調社子島與都會中心

的差異，來凸顯社子島日常生活的特色。而在地的社區發展協會，甚至以「最美的鄉下地方」的稱號當作對社子島的認同（見第五章）。儘管如此，從部分社子島居民們的生活地景與論述中，可以發現所謂「邊緣」未必就等同於落後、殘破而百廢待舉，而是一種樂活、共融之生活方式的可能；另一方面，這個「最美的鄉下地方」，並非一成不變而被動地等待來自都市中心觀看的地方，而是包括多元、移動的人們，這些人在受到都會防洪基礎建設影響的日常生活中，與社子島在地的人與非人共同創造地景與自我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夜弄土地公、端午節划龍舟祭江獲得更多的關注之外，長期以來作為社子島居民日常之一部分的親水生活，以及帶有農村特色的生活樣貌，在「生態社子島」開發計畫的陰影之下有了新的轉變。其中，反對該開發計畫的「社子島自救會」，便在 2020 年底舉辦一系列的社子島河濱生活體驗，包括抓螃蟹體驗、撒八卦網魚體驗等活動，並在堤防上舉辦小農市集，於坤天亭舉辦菜頭粿製作體驗等，透過這些基於社子島人們日常生活的體驗活動，展開不同於都市中心的社子島地景論述，讓其他關心社子島的人們「看見」社子島居民們的「日常生活地景」。

第七章 結論



為了理解防洪基礎建設與都市發展的關係，並探討基礎建設的感知面向，本文以社子島為研究地區，分析社子島防潮堤的興建與改建，如何改變社子島的土地性質、影響社子島的土地使用情形以及居民的日常生活，並在「臺北地區防洪計畫」的框架之下，成為臺北都會較獨特的區域。本文並進一步透過「地景」視角，分析作為「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之堤防地景的再現(representation)，以及與防洪建設、人水關係有關的日常生活。本文發現，部分堤防地景在文本中的再現，將較低的堤防與社子島的負面形象連結，而由臺北市政府等行動者發起的綠美化措施，試圖給予堤防建設除了防洪之外的意義與功能，企圖翻轉社子島的負面形象，卻仍有其限制；社子島居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則呈現了多元、有機而動態的特性。接下來，我將提出本文對社子島與臺北都會防洪之關係的主張，並在隨後提出對「地景」觀點的修正，以及穿越於「再現」與「日常生活」的地景觀點在討論都市防洪建設的潛在貢獻。

一、堤外廣土水環流：都市防洪建設的限制、衝突與機會

為了保護臺北都會地區免於洪水的威脅，臺灣省政府水利局以「200年洪水重現期距」為高保護強度，從1964開始展開「臺北地區防洪治本計畫」工程，在臺北地區興建一系列的防洪基礎建設。隨著行政院於1979年核定「臺北地區防洪計畫」的初期實施計畫，高保護區從臺北市延伸到三重、蘆洲等區域。但是，社子島由於地勢低窪、土地價值較低等因素，遭經濟部在1970年公告的《臺北地區防洪計劃檢討報告》指定為不予築堤的「洪氾區」，限制其發展進程。社子島的這段遭遇，似乎可以用Kane (2018)所謂防洪建設的「尺度不匹配(scalar

mismatch)」來理解，意即社子島是為了較大範圍區域的防洪考量，而遭「犧牲」的區域。而這種理解方式，也與許多關於社子島處境的主流論述不謀而合（如劉克襄，2011/6/12；吳美慧，2014；TVBS 新聞，2015/1/19；楊麗玲，2017）。

然而，在遭經濟部劃設為「洪氾區」之後，居民仍繼續在社子島生活，且持續有移民前往居住。另外一方面，雖然中央的防洪計畫未對社子島規劃築堤保護，但社子島防潮堤的建設仍於 1970 年代展開，該防潮堤並行政院於 1987 年核定的「社子島築堤保護案」中加高，將社子島的防洪強度提高到 20 年的防洪標準。將基礎建設視為「索求無度的環境 (a demanding environment)」的 Carse (2012、2014) 提醒人們，基礎建設除了可見的硬體之外，也需拉攏特定的人與非人行動者才得以運作，而這些行動者本身也是基礎建設的一環。在這樣的觀點下，「臺北地區防洪計畫」中，除了堤防、分洪道等硬體工程外，生活在「洪氾區」內的居民本身，也成了這個防洪基礎建設系統，需要拉攏、控制的一部分。然而，政府並未將社子島的居民強制遷移，也沒有嚴格執行禁建的限制，而是讓社子島發展蔬菜專業區、未登記工廠聚落。在居民的要求之下，臺北市政府不僅興建社子島防潮堤，並向中央爭取提高到目前的高度。如同 Carse (2012、2014) 主張，巴拿馬運河集水區在「發展」與「保護」之間的爭議，涉及了兩套基礎建設之間的衝突，社子島的處境，也可見到「臺北都會」與「社子島」兩套互有關係之防洪基礎建設系統的衝突，而包括諸多行動者之間的複雜關係。

除此之外，社子島之處境的背後，也與「都市」必須將「洪水」排除在外的觀點有關：一方面，1993 年後關於社子島開發案的討論，皆將社子島納入 200 年防洪標準的高保護作為前提。另一方面，與社子島防洪建設有關的再現，認為較容易淹水的社子島，代表落後、破舊而百廢待舉，而視社子島為一個被臺北「犧牲」的地方。儘管如此，本研究透過檢視社子島的土地利用與日常生活，認為社

子島隨著臺北都會的脈動，先後興起了蔬菜專業區、未登記工廠聚落等土地使用；位於防洪高保護範圍之外的社子島，除了持續有居民生活之外，也成為中南部城鄉移民、新移民、年長者的安居之所，是約 1 萬名居民的「家園」。此坐落於防洪高保護範圍而受到兩河所環繞的「堤外廣土」，遂成了不同人們的機會之地，而成為一個鬆動「都市」必須將「洪水」排出在外之思維的可能案例。

歷經數年的爭論，社子島開發案的支持與反對者仍難達成共識。雖然這些爭議的源頭，未必全與「都市」必須將「洪水」排除在外之觀點有關，其爭議未必能因超越該觀點便得解決。但是，如同 Kane (2018) 以及 Liao, Chan and Huang (2019) 的見解，試圖將洪水排除於陸地之外的防洪技術，僅能將洪水重新分配，而容易對防洪計劃保護區之外的鄰近區域造成負面的影響。因此，若無法跨越「都市」必須排除「洪水」的防洪思維，並進一步導入與水共生、適應而不畏懼洪水的「承洪韌性 (flood resilience)」觀念 (Liao 2012)，包括社子島在內等都市周圍空間因防洪需求而遭「犧牲」的問題，恐怕仍是難以化解的死結。

二、地景觀點再檢視

(一) 「觀看的方式」與「日常生活」的張力、揉雜與穿越

「地景」觀點與取徑，長期以來即有二元的性質，其中包括「再現」與「日常生活」的兩端 (Matless 2003; Wylie 2007)。地景觀點對於「日常生活」與「再現」的分野，可見於 1980 年代興起，視地景為「觀看的方式」的「新文化地理學 (new cultural geography)」，與 2000 年代以來，重視身體經驗的現象學與後現象學地景取徑的差異之中 (Matless 2003; Wylie 2007)。地景取徑在這些二元

關係之中如何取捨，已引起諸多學者的討論（Matless 2003；Wylie 2007；Neumann 2010；Kirsch 2015），而也有學者試圖以「地景 - 物（landscape-objects）」的概念，連結地景的象徵意義及物質與日常生活的層面，揭示這兩者之間似乎不是沒有交集的兩者（Tolia-Kelley 2004）。在此，我將透過經驗材料的反芻，主張研究者需要留意「日常生活」與「再現」之間的拉扯、揉雜與穿越的動態關係。

在第五章，本文除了討論堤防地景不同文本的再現之外，也談到試圖翻轉社子島負面形象的在地居民、社區工作者與政治工作者，以「打造居民兒時水岸生活」為構想出發，而引進外界的資源，展開一系列的綠美化措施。然而，回復兒時水岸生活記憶的構想，在歷經臺北市政府水利處與相關團體、公司的行政與經營之下，並沒有按照居民們回復早前親水生活地景來規劃，而是轉變成為來自都市中心之「觀看的方式」，改以「復育河濱生態」為導向進行人工濕地營造，這個結果並排除部分在地居民的參與。儘管如此，對於參與堤階認養人協會的社子島居民而言，每日早晨前往堤階照料植物已成為他們的日常；擔任濕地生態志工的居民們，也規律地參與棲地維護、環境教育等工作，重新形塑他們對社子島與自身的認同，甚至試圖翻轉水利處要求之環境教育知識的任務，將生態解說據點實踐成如「廟埕」的空間。這些看似外界對社子島之「觀看的方式」的地景，也逐漸內化到這些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從這些綠美化措施的發起與施作過程，可以發現從居民們試圖以日常生活來回應外界的觀看，卻在外界介入之下而轉成為另一種「觀看的方式」，但同時也對部分居民具有日常生活地景的意義。

另外，第六章提及的夜弄土地公、端午節划龍舟祭江活動，於近年來逐漸成為社子島之外的人們前往觀光、體驗的地景，而不完全僅有社子島的居民參與其中；在「生態社子島」開發案的陰影之下，「社子島自救會」也舉辦河濱捕魚、抓螃蟹等基於社子島人們親水生活的體驗活動，讓外界「看見」社子島的日常生

活，而成為一種由下而上的地景再現。在此，原本不需要對外展示、論述的日常生活，也成為另一種「觀看的方式」。最後，當人們爭論社子島的未來何去何從時，從都市中心治理者出發，欲將社子島「整頓」的觀點，也與一些基於社子島現有日常生活，反對臺北市政府之生態社子島開發案的論述之間，出現了 Wylie (2007) 稱作「張力 (tensions)」之衝突、矛盾與拉扯的緊張關係。

本文在架構上，使用「觀看的方式」之地景以及「日常生活」等兩種地景取徑，分析社子島的防洪基礎建設，並沒有否認地景有這二元關係的分野。但是，本文主張這兩類地景並非完全對立、無交集的兩者，而是具有動態的連結。首先，從日常生活出發的地景營造，在不同行動者的實踐之下，可能會成為另一種「觀看的方式」。其次，外界對於地景的「再現」，有機會回頭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甚至由人們日常生活反向塑造。此外，當日常生活受到外界矚目後，則容易出現作為「觀看的方式」的地景與日常生活揉雜的情形。最後，在爭議中，外界的觀看及論述，與基於日常生活出發的論述之間，也可能出現衝突與矛盾。

因此，本文主張，這兩大地景的分類之間具有雙重的連結、揉雜與穿越，而經常處於變動的狀態。而究竟作為「觀看之方式」的地景如何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在什麼情況會成為一種「再現」？其中又有哪些人與非人的參與？其結果又如何影響權力關係？這些都是未來可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二) 地景觀點與防洪基礎建設研究

最後，本文想討論地景觀點對於防洪基礎建設研究的貢獻。本文受 Matless (2003) 與 Wylie (2007) 啟發，採取了穿梭於「再現」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地景視角，在探討堤防地景之「再現」的第四章之後，改用「日常生活地景」的

關懷，檢視社子島的常民生活，以瞭解生活在地景之中的人們，與地景本身共同創造的過程與意義。如此，本文可以讓人們理認識到不同於部分都市規劃、水利工程中的觀點，從地景中之人的生命經驗出發，探討人從再現與日常生活對基礎建設的感知，並挖掘人與地景之間豐富而動態的關係。

探討地景觀點對於氣候變遷研究之貢獻的 **Brace and Geoghegan(2011)** 主張，透過考察日常生活，可以挖掘到在特定時間與空間之下，人們日常生活所體現的經驗與知識，可以讓研究者跨越「自然」與「人文」的對立，並認知與之相關的在地環境議題，並進一步影響氣候法規與制度，有助於研究者對氣候變遷等全球尺度的問題，有更深遠而寬廣的思考與治理。因此，雖然本文以位於臺北的社子島為研究區域，但目的並非僅限於對社子島之經驗的分析，而是期許以針對社子島的討論，來進一步瞭解、思考都市防洪建設對於都市周圍地區的影響，並探索不同形式之面對、承受洪水，而與洪水共存之方式的可能，增加人們探索都市防洪、都市周圍區域發展等議題時的思考空間。

在地景觀點之下，洪水、洪患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有緊密的連結；都市防洪建設，也涉及都市規劃、防災研究等知識社群之外的在地知識。透過認知到防洪基礎建設的社會、文化與日常生活等面向，並設身處地來瞭解「防洪建設」與在地經驗及知識的關聯。從消極面而言，能避免都市與防洪建設的規劃者、治理者，將學科本位的觀點逕自強加於在地，造成對部分在地行動者不利的後果。在積極面，研究者也可以透過地景觀點向生活在地景之中的人們學習，瞭解這些人在日常生活經驗之中面對洪水的方式，成為理論探討與實務應用經驗基礎。

參考資料



一、中文部分

TVBS 新聞 (2015/1/19)。台北威尼斯！柯改造社子島 逆向思考擴水道。TVBS 頻道。<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ZpAp0-aC5I>

(瀏覽日期：2020/1/13)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 (2016)。藝術進入社區—台北事件簿。臺北市：作者。

王志文 (2004)。台閩同源宗族空間組織差異研究--以台北淡水河岸與廈門環西北海域地區為例。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_____ (2007a)。以地理學的觀點來分析淡水河畔社子地區的古契約與地圖。淡江史學，18，247-275。

_____ (2007b)。台北淡水河畔社子沙洲歷史變遷。白沙歷史學報，4，1-42。

王志弘 (2013)。戲水：人水關係的除魅與返魅。休閒與社會研究，7，21-49。

王志弘與李涵茹 (2015)。綠色縉紳化?臺北都會水岸住宅發展初探。社會科學論叢，9 (2)，31-88。

王志弘、黃若慈與李涵茹 (2014)。臺北都會區水岸意義與功能的轉變。地理學報，74，63-86。

王應棠 (2009)。棲居與空間 海格德空間思想的轉折。地理學報，55，25-42。

王慶宗 (2015)。河川防洪建設與河岸地區發展變化之探討以大北地區防洪計畫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論文。

台灣省台北地區防洪治本計畫執行委員會 (1968)。台北地區防洪治本計畫第一期實施方案執行總報告。臺北市：作者。

江欣樺、王志弘與黃若慈（2018）。水的延展都市化：坪林水源保護區的領域治理。都市與計劃，45（2），131-160。

朱淑娟（2019）。不釐清社子島區段徵收必要性，日後爭議難解。風傳媒。

[https://www.storm.mg/article/1663404?fbclid=IwAR0SmKW5Xg5Sq8xx-](https://www.storm.mg/article/1663404?fbclid=IwAR0SmKW5Xg5Sq8xx-73MXYTks5TagdQft-J6GGSAW7tfj20vn9DIp807n9k)

73MXYTks5TagdQft-J6GGSAW7tfj20vn9DIp807n9k（瀏覽日期：

2019/9/3）

西岡英夫（1933）；杜武志譯（2001）。浮洲村落「社子」：鄰近島都的特殊村落之鄉土觀察記，臺北文獻（直字），138，260-267

吳美慧（2014）。幫台北背 44 年十字架的小島。商業週刊，1389。

李柏濤（2019/11/22）。滅村開發後果誰擔？社子島居民籲柯市府停手。中時電子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122002897260405?chdtv/>

（瀏覽日期：2019/11/22）

李進億與楊蓮福（2005）。臺灣環境發展史與蘆洲。臺北縣：博揚出版。

林吉洋（2019）。看見驕傲城市：從社子島與淡水河兩岸的城鄉變遷談起。環境資訊中心。<https://e-info.org.tw/node/217868>（瀏覽日期：2019/8/10）

林欣慧（2005）。看見社子島：從文化地景到地域性。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柳志昀（2018）。你不知道的「生態社子島」開發案，在地青年的觀察與剖析。眼底城市。<https://eyesonplace.net/2018/08/06/8567/>（瀏覽日期：

2019/8/10）

洪廣冀與何俊頤（2018）。自然資源治理與原住民部落發展：後發展與後人類的視角。考古人類學刊，89，93-141。

秦富珍（1994/11/7）。社子防潮堤長高了。聯合晚報，第十二版。

康旻杰 (2017)。地景敘事的詮釋與建構：臺北社子島文化地景的實驗性敘事操作。地理學報，86，49-69。

張世杰 (2020/6/3)。社子島濕地復育有成 鳥種穩定持續增加。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23/4610243> (瀏覽日期: 2020/8/3)

陳芳明 (2015)。台灣新文學史。臺北市：聯經出版。

陳怡婷 (2014)。花蓮羅山地區稀有植物鹵蕨保育之可行性評估研究。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論文。

陳竑達 (2011)。政府府際合作關係之研究—以臺北市社子島開發案為例。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陳鴻筠 (2019)。台北市社子島聚落關於城鄉化差異與空間沿革的社區集體記憶之研究。華梵大學建築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喬大地產 (2016)。喬大地產網站。 <http://www.khouse.com.tw/index.php> (瀏覽日期：2020/1/15)

楊金嚴 (1997/8/6)。社子島滯洪區解禁 舊事重提。聯合晚報，第十四版。

楊麗玲 (2017)。社子島！囚禁半世紀，被遺忘的孤島。臺北市：遠足文化。

溫振華與戴寶村 (1998)。淡水河流域變遷史。臺北縣：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經濟部 (2010)。臺北地區（社子島地區及五股地區）防洪計畫修正報告（核定本）。臺北市：作者。

_____ (2019)。臺北地區（社子島地區及五股地區）防洪計畫修正報告（第一次修正）。臺北市：作者。

經濟部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 (1970)。臺北地區防洪計劃檢討報告。臺北市：作者。

廖桂賢 (2017a)。規劃一個生態、正義的社子島未來。環境資訊中心。

<https://e-info.org.tw/node/17632> (瀏覽日期：2019/8/10)

_____ (2017b)。為什麼社子島開發計劃引發質疑?。環境資訊中心。

<https://e-info.org.tw/node/202582> (瀏覽日期: 2019/8/10)

臺北市士林區富洲社區發展協會 (2011)。社子島之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oDU5gXPpxI> (瀏覽日期: 2020/8/2)

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 (2006/6/6)

臺北市立文獻館 (2017)。「城市邊緣 兩河印記-社子島歷史發展」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臺北文獻 (直字), 201, 7-50。

臺北市政府 (1991)。擬變更士林區社子島部分農業區、住宅區、行水區、學校用地、公園用地、道路用地為堤防用地及新設堤防用地案。臺北市: 作者。

_____ (2016)。變更士林社子島地區主要計畫案。臺北市: 作者。

_____ (2021)。明日社子島網站。<https://shezidao.gov.taipei/Default.aspx> (瀏覽日期: 2019/8/10)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2020)。108 年工務統計年報 (109 年彙編)。臺北市: 作者。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2019)。北市賞鳥秘境在這裡 超過 40 種鳥類好看滿。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網站。

https://heo.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1FE45A3FEA3D194E&s=0BD328606207DE35 (瀏覽日期: 2020/8/3)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012)。101 年版地形圖。臺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

<https://www.historygis.udd.taipei.gov.tw/urban/map/> (瀏覽日期: 2020/9/5)

臺北市國民小學交通導護志工隊作業要點 (1999/8/11)

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會史編纂小組 (1993)。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會史。臺北市: 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

臺灣口述歷史協會 (編) (2013)。口述歷史實務手冊。臺北市: 編者。

臺灣省水利局 (1965)。淡水河防洪治本計劃修訂方案。南投縣: 著者。

劉克襄 (2011/6/12)。台北的尾巴, 中國時報, 藝文副刊。



鄭政誠 (1996)。三重埔的社會變遷。臺北市：學生書局。

錫瑠綠化基金會 (2007)。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事業轄區景觀規劃改善計畫工作成果報告書。臺北市：作者。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2019/11/22)。社子島不需 9 米高堤 重擬防洪計畫保生機；社子島環評暫停審議 修正主計畫重作範疇界定。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網站。
<https://erf.org.tw/> (瀏覽日期：2019/11/22)

聯合報台北訊 (1977/12/11)。社子防潮堤加高工程已全部完竣。聯合報，第六版。

聯合報訊 (1973/8/29)。保護四百公頃農作物 社子堤外中洲里邊 市府決加建防潮堤。聯合報，第六版。

_____ (1975/3/15)。社子島區基隆河岸 溪段防潮堤 工局決修築。聯合報，第六版。

謝梅華 (2008)。都市政權、規劃政治與市民意識的萌發：社子島開發案的想像與真實。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振坤 (2016)。打造親水宜居的社子島。眼底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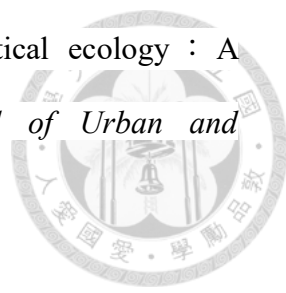
<https://eyesonplace.net/2016/12/12/4080> (瀏覽日期：2019/9/4)

簡佑丞 (2019)。日據初期的台灣河川治水事業與土木技師十川嘉太郎的貢獻。土木水利，第 46 卷第 1 期，頁 38-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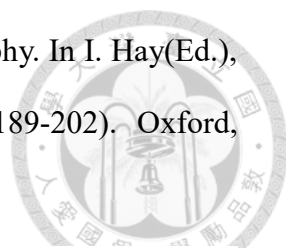
蘇碩斌 (2010)。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臺北市：群學出版。

二、英文部分

Anand, N. (2017). *Hydraulic city: Water and the infrastructures of citizenship in Mumbai*.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 Angelo, H., & Wachsmuth, D. (2015). Urbanizing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 A critique of methodological city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9(1), 16-27.
- Berger, J. (1972). *Ways of Seei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 Besky, S. (2014). *The Darjeeling distinction: Labor and justice on fair-trade tea plantations in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ace, C., & Geoghegan, H. (2010). Human geographies of climate change: Landscape, temporality, and lay knowledg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5(3), 284-302.
- Brenner, N., & Schmid, C. (2015). Towards a new epistemology of the urban?. *City*, 19(2-3), 151-182.
- Brox, T. (2019). *Landscapes of Little Lhasa: Materialities of the Vernacular,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in Urban China*. *Geoforum*, 107, 24-33.
- Carse, A. (2012). Nature as infrastructure: Making and managing the Panama Canal watershed.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2(4), 539-563.
- _____. (2014). *Beyond the big ditch: Politics, ec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at the Panama Canal*. Cambridge: MIT Press.
- _____. (2017). Keyword: Infrastructure – how a humble French engineering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In P. Harvey, C. B. Jensen & A. Motira (Eds.), *Infrastructures and social complexity: A Routledge companion* (pp. 27-39).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arse, A., & Lewis, J. A. (2017). Toward a political ecology of infrastructure standards: Or, how to think about ships, waterways, sediment, and communities together.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49(1), 9-28.
- Chien, K. H. (2015). *Water, informality, and hybridising urban governance in Taiwan*

- (Doctoral dissertation, Aberystwyth University).
- Connolly, C. (2019).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beyond methodological city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3(1), 63-75.
- Cook, I. (2005).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R. Flowerdew & M. Martin (Eds.), *Methods in human geography A guide for students doing a research project* (pp. 167-188).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osgrove, D. (1984).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 Cosgrove, D., Daniels, S. (1988). Introduction: iconography and landscape. in D. Cosgrove & S. Daniels (Eds.).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Essays on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design and use of past environments* (pp.1-10).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esswell, T. (2003). Landscape and the obliteration of practice, in K. Anderson, D. Domosh, S. Pile, & N. Thrift (Eds.), *Handbook of cultural geography* (pp. 269-281). London: Sage
- Cronon, W. (1991).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WW Norton.
- Elden, S (2018) Foreword. In P. Kimberley, P. Steinberg & E. Stratford (Eds.), *Territory beyond terra* (pp. xi-xv).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Gandy, M. (2002). *Concrete and clay: Reworking nature in New York C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_____ (2014). *The fabric of space: Water, modernity, and the urban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 George, K., & Stratford, E. (2016). Oral history and human geography. In I. Hay(E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human geography* (pp. 189-202).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ham, S., & Thrift, N. (2007). Out of order: Understanding repair and maintenanc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4(3), 1-25.
- Green, W. N. (in press). Financial landscapes of agrarian change in Cambodia. *Geoforum*,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20.02.001>
- Jackson, J.B., (1997). *Landscape in Sight: Looking at Americ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aika, M. (2005). *City of flows: Modernity, nature, and the c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ane, S (2018). Floodplains: Where sheets of water intersect: infrastructural culture from flooding to hydropower in Winnipeg, Manitoba. In P. Kimberley, P. Steinberg & E. Stratford (Eds.), *Territory beyond terra* (pp. 107-126).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Kirsch, S. (2015). Cultural geography III: Objects of culture and humanity, or, re-‘thinging’ the Anthropocene landscap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9(6), 818-826.
- Larkin, B. (2013).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 327-343.
- Liao, K. H. (2012). A theory on urban resilience to floods—a basis for alternative planning practices. *Ecology and society*, 17(4): 48.
- Liao, K. H., Chan, J. K. H., & Huang, Y. L. (2019).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flood prevention: The moral cost of floodwater redistribution.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89, 36-45.

Matless, D. (2003). The properties of landscape, in K. Anderson, D. Domosh, S. Pile, & N. Thrift (Eds.), *Handbook of cultural geography* (pp. 227-232). London: Sage.

Mitchell, D. (1996). *The lie of the land: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California landscap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orita, A. (2016). Infrastructuring amphibious space: The interplay of aquatic and terrestrial infrastructures in the Chao Phraya Delta in Thailand. *Science as Culture*, 25(1), 117-140.

Morita, A., & Jensen, C. B. (2017). Delta ontologies: infra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Chao Phraya Delta, Thailand. *Social Analysis*, 61(2), 118-133.

Neumann, R. P. (2011). Political ecology III: Theorizing landscap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5(6), 843-850.

Rose, M., & Wylie, J. (2006). Animating landscap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4, 475-479.

Safransky, S. (2014). Greening the urban frontier: Race, property, and resettlement in Detroit. *Geoforum*, 56, 237-248.

Sauer, C. (2008[1925]).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In T. Oakes & L. Price (Eds.), *The cultural geography reader* (pp. 108-116).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chein, R. H. (2010). Cultural landscapes. In B. Comez & J. P. Jones III (Eds.), *Research methods in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p. 222-238).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Shurmer-Smith, P. (2002). Reading texts. In P. Shurmer-Smith (Ed.), *Doing Cultural Geography* (pp. 123-136). London: Sage.

Star, S. L., & Ruhleder, K. (1996). Steps toward an ecology of infrastructure: Design and access for large information spaces.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7(1), 111-134.

Steinberg, P. E. (2013). Of other seas: metaphors and materialities in maritime regions. *Atlantic Studies*, 10(2), 156-169.

Steinberg, P., & Peters, K. (2015). Wet ontologies, fluid spaces: giving depth to volume through oceanic thinki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3, 247-264.

Swyngedouw, E. (1996). The city as a hybrid: on nature, society and cyborg urbaniza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7(2), 65-80.

_____. (2004). *Social power and the urbanization of water: flows of power*. Oxfor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olia-Kelly, D. P. (2004). Materializing post-colonial geographies: examining the textural landscapes of migration in the South Asian home. *Geoforum*, 35(6), 675-688.

Tzaninis, Y., Mandler, T., Kaika, M., & Keil, R. (in press). Moving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beyond the 'urbanization of natur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20903350>

Wachsmuth, D. (2014). City as ideology: Reconciling the explosion of the city form with the tenacity of the city concep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2(1), 75-90.

Wylie, J. (2005). A single day's walking: narrating self and landscape on the South West Coast Path.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0(2), 234-247.

_____. (2007). *Landsca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